

傳雄英

集一第

著等艾莫、玲丁



新華書店 晉察冀分印店

丁玲、莫艾等著

英 雄 傳 (第一集)

一九四六年二月

新華書店晋察冀分店印行

目 次

趙占魁同志.....	張鐵夫(一)
袁廣發.....	穆青(二)
模範黨員申長林同志.....	丁玲(一九)
張治國的故事.....	荒煤(三一)
劉主任.....	周民英(五三)
	莫艾(七五)

趙占魁同志

張鐵夫
穆青

——他沒有突出的表現，也沒有感人的故事；三年來他平凡的工作着，例如泉水滴擊着岩石。

一 在工場裏

一點鐘的時候，太陽正毒。別的股都收了工，而且人們都吃完了飯去睡午覺了；但是，翻砂股的二十多個人還在繼續的工作着。這工作對他們養成了一種習慣，每遇到該的時候，他們都是從早晨起一直到完成了一天的任務才收工，中午從未休息過。

打心子的那個屋子裡，五六個人在忙着打心子，翻砂房裡也在裝着砂箱；院子裏，幾個圍着新皮箱的人在那裡揀着炭，或者放到天平上去秤鐵。總之，大家都在緊張的工作着，而愉快的談笑聲不時的從每個角落裡發出。院子中心高立着的熔鐵爐裡，發出

在這工作的人羣裡，你可以發現一個這樣的人：這個人有四十多歲，是個高個子，長方形的臉，腰裡束一條半新不舊的皮圍裙，頭上戴著一頂沾滿了灰的草帽，兩個較大的門牙，隨着他的不斷的微笑，露出來。而且在這樣炎熱的天氣，他還穿着棉襪，還站在那兩千度以上的熔鐵爐的旁邊工作着，時常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去擦臉上的汗，他，就是趙占魁。

他是這股的股長，也是這廠裡最老的工人之一，但他却從沒擺過架子，或者賣過老資格；每次開爐的時候，他都在天不明時就起床，先叫起一兩個學徒把牲口套上，把火生着，然後再把大家喊起來。在工作中，他擔當了最艱苦也是最難幹的工作，並且他還要分配和照顧每一個工作部門，直到一天的工作完了，架了爐，他先讓大家回去，然後自己收拾了所有的工具，再圍着工廠巡視一周，才走回去。

現在工作正在緊張的進行着；並沒有任何人阻止，笑聲就自然的消逝，工廠隨着開始了工作。聽見的，只有翻砂間裡鐵模子的擊響聲，風車的叫喚聲，以及爐子裡白色的火柱噴出來的嗤嗤的聲音，夾雜着很粗的喘息和匆忙的脚步聲。

趙占魁也和大家一樣，在沉默裡用手緊拿着鐵鉗，吃力的站在高凳子上，從爐口向

爐內看來，用鉗子把堆積着的鐵塊一塊塊的鋪平，放進火苗裡；突然，一陣風吹過來，猛烈的撲向他的臉上去，他連忙向後仰了一下，被迫跳下凳子，鐵鉗沉重的落在燒爐的長柄上，發出鏗鏘的聲響。

他半晌才睜開了眼睛，稍微喘息了一下，汗也不擦，又匆忙的去搬開通風筒，彎着腰，從氣管裡用鐵棍往外撥弄着被燒紅了的渣滓；然後又反轉身來吆喝一下驃子。

『噠，噠！』

但是，馬上他像又發現了什麼毛病似的，急忙的到鋪砂間門口撿起一條麻袋，然後走過去停住驃子，把麻袋疊好整到牠的頸子上，到一切都弄好之後，便用手拍了一下驃子的屁股，驃子又照常的走動起來。

等老趙又重新回到爐邊，當他揭開了用泥封上了的爐嘴的時候，那裡邊的燒好的鐵水，已經流到嘴口來了，他便趕緊的把渣滓撥弄出來，然後喊一聲：『

『起噠！』

立刻，人們忙亂起來，三四個人忙着去掀爐子的長柄，幾個拿着鐵杓的人急忙的來

同的走動着，通紅的鐵水，從爐嘴流進了鐵杓，然後再端這翻砂房，往那製好了的砂模的眼孔裡倒進去。

『要是鐵水冷一點就別倒，把它潰到地上吧！』老趙向端鐵水的人招呼着，臉上的汗出得更多了。這時候他的全幅的精力注意着翻砂房，他向每一個人走回來倒鐵水的人問：

『成了幾個？』

這可以說是每個人所屬懷着的問題，幾個年輕的學徒甚至吵了起來：

『五個，五個……』

『七個！』

到七個這數字被喊出以後，所有的人便都圍了過去，老趙是擠在最裡邊的。這時候他的兩個大門牙又露了出來，其餘的人也都微笑着，看着老趙，看暫時被鉗子夾出來的通紅的鐵殼。

是的，老趙是應該比別人更歡喜的，他會想起來兩年以前的事，那時候倒出來八個只能成三四個，而現在竟能成七個了。這成績首先是他的功勞，他領導了全股工人改進。

了工作，譬如：鐵水鍊得更滑了，心子和模型製造得更精確了，最主要的，在他的培植下，有好幾個學徒，已經成了熟練工人。

老趙沒有因為歡喜停止了他的工作，他彎着腰站在大家中間，用鐵錐撥弄着倒壞的鐵殼，向大家講述着那一些是因爲鐵水不好，而那一些則因爲心子放偏了一點的原故。可是這講述沒繼續多久，一會兒，他又慌忙的跑回爐邊去。

他是這裡的軸子，一切的工作都隨著他在轉動，爲了這，他不能停止，而且他自己也永遠不會停止。

他揩好了爐嘴，用泥封上以後，喝了兩口水，便匆忙的跑到翻砂房裡去。

一個學徒，停止了他的工作，坐到凳子上休息下來，看見老趙走過來，便瞪着眼看着他，但是老趙沒有說他，反而向他笑了一下，好像在說：『看我幹什麼呢？我不會責備你的，我知道你平時工作很積極，休息一下吧，我們這裡不是外邊打罵人的工廠！』

對於這一點，老趙認識得很清楚，他常常這樣說：『過去在外邊工廠裡一天磨洋工，工頭來了就加勁幹一會，在我們這裡可不同，就是沒有一個領導人管，工人也有自己的積極

的工作。要是真的累了，就是廠長在這裏也可以休息，他不會說停的……」

是的，老趙從來沒有打罵過工人或者學徒，相反的，他都是很耐心的指引每個人的工作。比如過去有一個學徒，由於粗心一連做壞了好幾個心子，可是老趙沒有生氣，他很靜氣的走到那學徒的面前教導了他而且對他說：「同志要留心點，這是對革命工作啊！」的確，對於別人的錯誤，他不是遷就，也不是責罵，而是用很耐心的教育與說服。在平時，他能和大家打成一片，特別是幾個青年工人和學徒，他幾乎每天和他們在一塊玩笑，他喜歡他們，他們也喜歡他。

在他的努力和領導下面，已經有好幾個學徒變成了熟練工人，並且跑砂盤的工作大大的改進了，首先是他的鐵的鐵水比以前清了，心子和模型也比以前製得好了，過去只能倒成八分之四，而現在變成八分之七了，這是多麼驚人的進步啊！

他在全廠裡有著很大的信仰，無論你去問誰，沒有一個不尊敬和欽佩他的，而這，主要的不是由於他的年紀大或者技術好，還是由於他的待人誠懇，能幫助人，還有他自己工作中的埋頭苦幹和他的模範作用。

在過去翻砂房還沒有蓋起來的時候，一些工具和模型都是擺在露天裡。只要天一陰，那怕就是漆黑的夜裡，不用任何人來喊，老趙便一個人起來，把東西搬到屋裡去或者弄些什麼東西蓋起來。他有了病從沒請過假，特別是今年四月間，他帮機器試驗彈花機，一不留神，他被馬拉架軋爛了一個手指，當時他只用手指按着，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他走後別人在馬拉架上發現了碎骨頭才知道他被軋着了，便趕快去看他；那時候，他已經自己包了起來，又在用另一隻手拿着鐵棍在燭爐子，大家都勸他停止工作，廠長也叫他到醫院裡去治療，但是他沒聽任何人的話，依然在工作着，並且說：『不要緊，我的手是橡皮的！』

他總是把工作看成第一，只要是爲工作，他自己什麼都可以犧牲的。比如去年有一次他病得實在不能工作了，便換了另一個人來看爐，但因爲這個人缺乏經驗，熬了兩爐都不能用，他聽說了，便掙扎着爬起來，拄着拐杖走到工廠裡，看着，指導着。一直在那裡坐了一天。

就這樣，他工作了三年多，現在他雖然已四十六歲了，却依然在積極的工作着。他

依然每天天不明就起來，在燶人的塔爐旁邊工作一整天，臉上流着汗，身上的棉襖被汗漬濺結了很厚的白鹹，但是他沒說過一句埋怨的話，也沒有偷過一會飯。相反的，他每天都是過得很愉快，關於這，最好用他自己的話來解釋吧：

『工廠是黨辦的，我是個黨員，工廠也就是我的！』

二 老趙是從火裏鍊出來的

一個和趙占魁在同溫路上一塊工作過的同志，曾經這樣說：『老趙是從火裏鍊出來的！』

是的，趙占魁是從火裡鍊出來的，這從他將近三十年的歷史便可以得到證明。

在他的自傳開頭是這樣寫著的：『我是山西定襄縣張村人，家貧，有人七口，務農爲業，家有田八畝，窖四間，毛驥一頭。』

由於他的家貧，小時他的父親便去戶外（察哈爾），兩個哥哥在家務人帶工。在那些飢荒年間，由於顧不上吃的，他們家裡過過很多挨餓的日子。等到他十七歲時便學

了鐵匠，學了兩年就到太原去當泥小工，後來又經過銅元廠，翻砂廠，最後又到同蒲路上去打鐵，一直二十多年的日子，這都是在燒鐵爐或者化鋼爐的旁邊過去的。

一九三七年，爲敵人所逼，便逃到了西安。在西安住了幾個月，『聽說延安是工人出頭的地方』，便向一個捷徑的伙伴一同經安吳青訓班來到延安。

到延安後入了抗大職工隊學習，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那裡入了黨。一九三九年職工學校開始辦，他又被調到該校去學習。這時候，他已有了明確的認識，而且一種新的自由的生活，給了他二十多年被壓抑折磨了的心以很大的安慰與興奮：『日後就痛快了，雖然工資少，但有不滿意的事情可以開會說話了，並且自己是一個黨員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他從職工學校被調到農具工廠工作，一直到現在三年多了，在工廠裡，由於他的工作的積極，負責，得到全廠上下一致的擁護與讚美，在每一次競賽中他都是甲等勞動英雄獎章的獲得者。

他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在工作着，對於現在的工作，有着很正確的認識，他這樣說：『在外邊積極工作是爲了吃飯，因爲不積極飯碗就會被打破，在這裡就不同了，

在這裡工作是爲了黨，爲了革命啊！」

過去二十多年艱苦工作的日子，鍛鍊了他，也給他留下了很深的記憶。他沒有忘記當學徒時受過的師傅的打罵，沒忘記那些資本家對他的剝削和工頭對他的侮辱，他沒有忘記因爲拉了汽笛晚到五分鐘便拿不到牌子而失業一天，或是因爲一點點不注意被扣除了工資。他沒有忘記常常逼着他不能供給家裡甚至連自己吃飯也維持不住的那些日子。

「咱們這裡，就是自由痛快，遇事大家商量，工人可以隨便找廠長談問題和兄弟一樣，公家管吃管穿還發錢，人只要心裡痛快，就是工作再累也甘心！」

一提起過去，他總是說這樣一段話，這是二十多年得出的一條真理，也是現在支持他工作的力量。

三 驚人的耐心和仔細

趙占魁會做領導工作，但他也是一個仔細的有耐心的誰做一點一滴瑣碎事情的人。

他會經營過一年多的合作社，現在他被選為工會委員和生活管理委員會的伙食委員。而且這些工作都是不脫離生產的。在正式的每天九個鐘頭工作以外的工作。

但是，他却勇敢的接受它，而且把它做得很好。

他管理合作社的時候，每天下了工便坐到合作社裡去照顧生意，一直到大家都吃完了飯他才關了門去吃飯。並且一年多的時間裏沒錯過一分鐘，工會工作也是這樣，這幾天，正逢發布的時候，每天都耽誤了吃午飯去工作。

吃飯的問題，是一件最麻煩也最難辦的事，特別是我們今天經營這樣艱難，而工廠又是才改變，驟然增加了這樣多的人。但是經他一管理却有了很大的改善，現在工廠每週可以吃兩次肉，三次饅了。這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了不起的天才，而是由於他對工作驚人的耐心和仔細得來的。

有一次，上午收了工，大家都擁到廚房裡去吃飯，忽然大家嚷了起來，原來飯有點生；這時候老趙可忙壞了，他一面告訴大家不要吵，一面找伙夫商量辦法，他自己便下手去抱柴，去抬籠，在又嗆又燭的火房裡忙亂着，一直到籠上了鍋，他再拍拍伙夫班

長的肩膀說：「同志，不行！我煮一鍋稀飯，別叫不够吃，大家都做了工，吃不行。」然後自己拿了一片就是剛才大家嫌生的米飯塊，吃着，走出廚房。

在每次會餐時，他都是從頭一天下午起就開始忙了起來，秤糧，買肉，買調和……一直到第二天大家都吃到肚子裡，才離開廚房。但是他自己是一個不吃肉的人。

一切爲了大家，而完全忘却了自己的人，是多麼難得啊！可是趙占魁就是這樣的一個。

今年春天，有一次他晚上收工回來，一個病號來找他：「老趙，我還沒吃飯哩，你這伙食委員幹什麼的！」想一想吧，一個寄病的人性情很容易暴躁的，況且他現在還沒有吃飯呢！就這樣他對老趙說了許多難聽話，可是老趙沒有生氣，他對那個病號說：「別急，同志，沒吃飯我給你做去。有話慢慢講，何必發這太脾氣呢？」說着，他馬上走進廚房給那個病號做了飯。

他把自己的錢看得很輕，他常常這樣說：「公家管吃管穿要錢幹啥！」他很喜歡买东西給大家吃，有過好幾次這樣的事情：在工作中大家都餓了的時候，他不聲不響走到

外邊，買一些餅子回來分給大家。這次工廠裡一個學徒的老婆死了，工會號召大家來募捐。他沒有說一句話，拿了一隻鉛筆在募捐簿上寫了幾個歪歪斜斜的字：

「趙占魁捐洋四十元。」

在支部對他的鑑定表裡，對於他的這些工作會這樣寫着：

「……他當營造合作社的主任，雖他識字不多，可是帳目和貨款都搞得清清楚楚。現在他擔任生活管理委員會的工作，在他的工作下節省了糧食，消除了浪費，最近不但伙食改善了，並且每月還可以剩餘一筆錢，他的工作精神得到了全廠同志的信仰……」

四 工人參議員

去年第二屆參議會選舉時，參選的熱潮普遍到邊區的每一個角落，在工廠更是鬧得特別熱烈，全廠裡好幾個人參加競選，但是經大家投票的結果，趙占魁得到了勝利，成了正式候選人，而且經四個工廠共同選舉的結果，他被選為候補參議員，被選的條件是

：（一）能代表大家的利益和意見；（二）在工人中有威信；（三）做事負責任，牢靠而且他是個共產黨員。

當時有人給他開玩笑，問他：「老趙，你當了議員啦，可是不識字怎麼辦呢？人家要是叫唸你一個「公事」，那不是瞎子吃芥末乾瞪眼嗎？」對於這，他却一點都不在乎的回答他們：「哼，參加工廠這麼久，俱樂部就是馬列主義學校，雖說識字不多，可是『抗日救國，收復失地』這八個字總還認得牢，再說，咱邊區不像外邊，不識字一樣有資格替大家辦事！」

就這樣，老趙到延安去開會去了。工廠裡沒有了他顯着很寂寞，大家都感覺到像缺少了一件最重要的東西似的，整天的盼望他回來。特別是那些年青的學徒們，幾乎每天都跑到廠長那裡去問：「老趙還要幾天就回來呢？」

那一天，聽說他在大會上還發表了許多意見。

開完參議會回來，大家都圍着他，問他開會的情形，但是他們幾乎失望了，老趙並不能馬上用很生動詞句給他們講一些場面，或者有趣的故事，他只是重複着這樣一句話

：「我們共產黨真沒說的，說啥就是啥，大公無私！」當時大家……還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意思，後來經過他的慢慢的，零零碎碎的敘述，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像。他向人述說着開會的經過，向人講三五制的意義，他向人說：「三三制就是實行民主，政府是大家選舉的，我也選了一票。並且選舉是按照三三制，就像李副主席，不是共產黨員，也被選當了副主席！……」他幾乎每天晚上，在每一次工作中休息的時間，他都向大家講着，他講得多麼興奮啊！廿多年低着頭過日子，現在他竟然親手來選舉政府中的主席，對於他，這還是生平第一次。特別是聽到毛主席親自擔着七十九歲的李丹生老人上台的時候，他是那樣的被感動了：「毛主席真親愛啊！」每一次，他都把這句話重複好幾次。

從參議會回來以後，他對於自己的工作更加積極，對於自己的說話或行動也更加檢點，因為在選舉時，公開了他的黨員的面貌。「我是一個黨員，不能叫人家因為自己不好說黨的壞話」。並且他時時背誦着在參議會上高崗同志的講話：「我們今天實行三三制就是開了大門，大門開了，看我們同志們做的怎麼樣吧！」

雖然他在工廠裡工作，但對政府和老百姓的事情都很注意。他曾因為一件老百姓離婚的案子寫信到常駐會去，而且他看到有些老百姓因為要逃避公糧負擔，把地租給人家，自己搬到山溝裡去的時候，他說：「搬到山裡去，原地既可收租，新地方又可充新搬來的不納糧，這樣就使得別的老百姓的負擔加重。再開參議會時。一定要提個意見。」

最近，總工會又通知要召開參議會代表會，他聽到這消息，便積極的通過各工會小組徵求意見和提案，準備帶到參議會上去。

五 「我還能工作二十年」

能够把生鐵塊溶化成液漿的水，像能够測量它具有多大的熱度嗎？在這種火的旁邊工作了二三十年的人，他是需要有多麼堅強的意志呵！趙占魁的意志就是從火裡鍛鍊出來的。工作對於他好像有一種不可知的吸引力，使得他永遠不能和它離開。而且在這三年的鍛鍊當中，對於一些問題有了很正確的了解與認識。他常常對人說：「自由就是有事大家商量，有意見可以找最高的首長去提，如果答應見不到可以提意見轉達。要是

跟沒繩繩的馬一樣亂自由一氣是不行的；你還想上天哩，可是沒有上天梯呀！」一再說平等，平等就是大家一樣，工人也能當參議員，誰也不敢負擔。可是有些人把平等看成平均了，看見人家騎馬自己也想弄一匹馬騎，看人家後頭跟個特務員自己也想要一個，那不行，人家是因為工作需要啊。像一個工人，要個帶盒子槍的跟在後邊幹什麼呢！」

有些人對自己，對工作，往往加上幻想的外衣，因此單憑自己的熱情工作，也許一開始會表現得很好，但是不久，當那美麗的外表被剝去以後，它便冷卻下來，甚至完全把自己的工作放棄。趙占魁不是這樣，他是一個從實際出發做事情的人，「要就不幹，要幹就幹徹底，除了不說，能說到就做到。」這是他常常對別人講的自己的哲學。他就是憑著這個認識和毅力取得全廠信仰的。因此他並不輕易講話，也最看不起那些架空的言語和文字。有一次在工會委員會上，因為有客條例中的客房問題，他非常嚴正地阻止了大家的沉默通過，他說：「這一條我們不能沒有意見，因為現在客房這根本沒有蓋，再說也沒有預備下鋪板和被子；要是通過了說有客人必須住在客房裡，那麼有工人把客人交給工會的時候，我們怎麼辦？所以我們不能叫別人堵嘴，現在做不到的事情，現在

就先不要說。」

同時和這個認識並行的還有一點，那就是他曾經向學徒們時常提醒的：「不要爲自己的事費心，應該多多把心用在工作上。整天爲自己的事跟別人發生問題，那是恥辱。」

最近工廠裡有一個學徒要請假回家，老趙便對他說：「慌啥呢？再有兩年就把日本打走啦！」可是，當別人問起他將來怎麼辦的時候；他卻這樣說：「我今年才四十六歲，還能再工作廿年。」

說這話的時候，他總是微笑着，那微笑裡是充滿着堅強的勝利的自信的，聽到這話的人，你不能不爲他的這種自信而興奮嗎？

〔一九四二年九月解放日報〕

袁廣發

丁玲

——陝甘寧邊區特等勞動英雄——

當三六年紅軍東征的時候，紅二十七軍二百四十團裡有一個極為勇敢出色的營長，那就是袁廣發。他從二九年以一個織布學徒參加了紅軍以後，在他的家鄉鄂豫皖一帶活躍。身經百戰、千戰，鍛鍊成一個堅強的戰士，和一個優秀的幹部。在對反革命者的尖銳鬥爭中，他越來越愛同他一樣的窮苦人民，和他所從事的革命事業。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建立過很多戰功，六年來沒有在房子裡睡過覺，沒有脫過衣服睡覺，每天裏頭都是濕的。流過好幾次血，右臂、左臂、手上、腿上都留下槍彈刺刀劃過的痕跡。在紅軍粉碎了敵人的五次「圍剿」之後，他又隨着徐海東同志以血戰越過了平漢線，經漢中甘肅而到達陝北。有名的勢山一役，二十五軍在正面，他帶領的一連擔任主攻。二十六軍二

十七軍在兩側，三面一包把敵軍先進來的兩個團殲滅了，後續的也不能倖免，俘虜很多，敵軍的師長也自殺了。跟着，他就被調到二十七軍當營長，很快便能同語言不通的弟兄們打成一片（二十七軍係陝北紅軍）。他們愛他，跟他隨大隊紅軍渡黃河東征，他們到了山西，沿河鑿壘一露光，大軍直抵石樓，當他接到攻開石樓的命令後，自己就掛了兩排短槍，四五顆炸彈，帶領了第一連在天黑後爬城。敵人警戒是很嚴密的，但他們摸到了城邊，安置好很多梯子，他走在最前邊，爬上了梯子，一級一級的跨上去，看看快到城垛口，却忽然被敵人發現了，一陣雜亂的槍聲，子彈像爆豆似的飛來，袁廣發同志的腿上，狠狠的中了一彈，他站不住，從幾丈高的城牆邊上倒墜了下來，暈倒在牆底下。傳令兵拖着他離開了火線，同到了師部，又轉到醫院，他沒有死，又活過來了。但他却因為這第七次的受傷使他脫離了炮火生涯，他沒有能繼續發揮他作戰的才能，成為一個更重要更出色的軍事指揮者，是八路軍的一個損失，但他轉到生產戰線上之後，却又使邊區的工業生產發出光輝來。

一個經常在榆林彈雨中馳騁的英雄，對於病院生活是不耐的。他的傷口好了又壞，

幾次要求回到前方去。他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不能坐着吃。』於是軍事委員會的同志便問他：『你還能作什麼，暫時先作點別的也可以。』這位營長便說：『我從前是一個織布學徒，我會織布，我可以去織布，不過我的腿一好，我就要回到前方去。』

他的要求被准許了。他便交上他的馬匹，他的手槍，他的勳章；愉快地拖着受傷的腿到了紡織學校。七年前他曾用雙手替資本家織布，受資本家剝削，而經過七年的戰鬥生活之後，負傷七次的袁營長又歡喜的用他流過血的雙手為自己的工廠流汗織布，紡紗。軍事委員會接受了他的馬匹，代替他保存着槍（這手槍已跟他四年了），退還了他的勤務員，要他留在身邊，因為他的身體並不好。不久他仍舊交給公家了。他說：『今天我做工，是個工人，要什麼動盪！』後來他的傷口慢慢好了，却因為比較重，傷了筋骨，不便作戰，使他不能再回到夢魂萦繞的前方了。又因為他過去是文盲，在部隊中終年打仗，沒有得到學習的機會，認識字不多，一時也沒有適當的工作，加以職業學校的轉移，他跟着跑去跑來，竟淹留幾個草創的生產機關之中。當貿易局開辦營作社主任訓練班時，他知道他們一時為找不到管理員和伙夫而焦急，他便以他過去在戰場上的氣概說

：「有我，你們就不愁沒有飯吃。」他做了兩個月的飯，把幾十個人的伙食調理得很好，絲毫沒有覺得這於他的營長身份有什麼損失。

三八年六月邊區政府民政廳創辦難民紡織廠，廠長吳生秀在邊區黨校物色到他，找他談話。他好容易才得到這個學習的機會，正擬設法延長他的學習時間，聽到了又要找他去做工，他只說：「黨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自己沒有旁的意見。」於是他就又搬到民政廳，奔走於造工廠創辦過程中的一切繁雜事務。

這時袁廣發同志是到了比從前打游擊更困難的境遇，陝北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經濟落後，原料缺乏，技術人材難找，很多人都懷疑這荒涼的山溝是否可辦工業。但邊區政府有這個決定，認爲應該也可以辦工業，那末凡是共產黨員就應不怕一切困難，斬除荆棘開闢出一條道路來，廠長吳生秀同志有他堅忍不拔的魄力，遠大的眼光，層出不窮的辦法，把難民紡織廠由一萬元的資本在四年半當中發展到一萬八千八百六十二石糧，以三千五百元一斗米折價約合六萬萬六千零十八萬三千餘元。從他和袁廣發兩個人擴充到五百餘人。截至四年底共產布疋二萬三千零八十二疋，毛氈二萬零九百六十九床，

毛巾襪子不算，各種合作性質的出產還未計算在內，現在能製造各種機器、零件，解決本廠所有需要並幫助了很多工廠。在這樣大的成績中，與廠長固然是主要的功臣，但袁廣發的名字也一樣不能與華民紡織廠分開，他是這廠內第一根擎天柱，不特廠長如此說，全廠的工人也這樣把他看待，他已經兩次被選為全廠的英雄，出席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且榮膺為邊區的特等勞動英雄，的確不是偶然的。

籌備了兩個月，工廠在川口開工了，第一次從西安買來了八部機子，找到了朱次復技師（山東來的，是廠內第二根柱子，去年被選為邊區甲等英雄，今年也出席邊區勞動英雄大會。）和十幾個工人，這些工人都同袁廣發的技術差不多，勉強能使用木機織布，或者是鐵機，或者織襪子。對於漿紗，漂染，經驗都很少，只有崔襄鼎是一個熟練工人，可是老崔織布不願意有人在旁邊看，假如袁廣發在旁邊，他就只用一隻腳織機子，一隻腳跳起來，洋洋地唱着河南調。袁廣發心裡想：假如我不能掌握技術，我還做個什麼工，假如廠裡只能依靠像老崔這樣的工人，那如何行，非偷會他的本領不可，一定要在兩個月內趕上他。於是用打仗的精神，日夜加工，暗地留心老崔的一舉一動，虛心

的問朱技師，不到兩個月，他竟趕上了老崔。他又向朱技師學裝機子，學修理機子，與老工人王鳳仁研究漿紗。誰的機子壞了，他就與他換織，這樣可以熟習機子的各種毛病，又可以懂得如何修理它。別人挑選剩下來的壞紗，也等他織，這更需要細心，但也更增進了他的技術，因此四五年來他成為廠內技術最好的工人，一直到現在全廠五十二部鐵機，十部木機，沒有一架他沒有織過，他了解每部機子的構造，那一架輕，那一架重，那一架的大軸有毛病，那一架的捲軸太緊，就像了解他的手指一樣，因此每次訂布的標準，訂工資的標準，都憑他的努力織出最高的產量和質量。

這時工廠的工人成份，一部份是殘廢軍人，一部份是武漢來的工人，殘廢軍人有很多不安心，外面來的工人對革命的認識還不够，督氣很壞，某些同志對於職工與廠方的關係也不明瞭，把工會與廠方對立，工人生產情緒不高，生活要求很多，浪費原料，袁廣發看不慣這種現象，却孤掌難鳴，於是耐心的去說服教育，團結了一羣較好的殘廢軍人與那些壞思想做鬥爭，他只有一個心思，工廠是革命的，是咱們黨的，一定要把它辦好。他當過支部書記，當過工會委員，工會主任，與廠裏非常信任他，幾個好幹部也

同他搞得好，一部優良進步的工人也擁護他，但有毛病的人却不敢喜他。怕他，舊地裡罵他「溜官害民」，甚至計劃着撲滅他，但一點也不氣餒，也不煩躁，仍是堅持下去。做王吃苦他走在頭裡，休息時間不下機子，任最壞的惡河，頭等技術却只肯拿三等工資；寸紗滴油都像珍寶似的愛惜。有一次工廠在永寧山搬家時，剛下過大雨，河裡漲水，山路特別難走，又窄又滑，一個工人不當心，將一大綱紗滾到河裡去了，水勢又激又險，眼看要被沖走，岸上的人全驚喊亂叫，這時袁慶發不解一切縱身跳到河裡，他是不會泅水的，激流推着他，打着他，這才引起好些人都跳下去，大夥兒把紗撈上來了，也拉上來幾乎被淹死的袁慶發，別人問他：「又不會水，何必跳下去？」他說：「革命財產要，我不跳下去，誰跳下去！」

工廠一天天的向上發展，但工廠管理仍不免有些弊病，有些幹部搬來外邊的一套管理制度，不適合，有些本身還帶着一些官僚主義，有些又是外行，在四二年的時候，工廠各種雖然發展到有五百餘人，但病號每天常有八九十。工房裡的人跑去跑來，津管委棄遍地，每天廢紗有二千斤，一月要消耗機油二噸半，……每月也有生產計劃，不過

只有科長自己知道，有時也通知一下工人，但能否完成，或完成與否，則連科長也不知道了。至於工資，則從實物貨幣混合工資制到試行計件累進制，工人之中仍有一個思想：“幹不幹，一斤半”，還常常要求補充這樣補充那樣。他們揀香，揀杷子，只肯工作八小時，學習、開會、娛樂都要佔工時。袁廣發同志雖然這時還只是一個股長，但他在保衛工廠的意念下，堅韌的鬥爭着，自然有時他的態度會不好的，給反對者以藉口；可是很多工人都了解他，甚至有些吊頭相當的，揀了他的馬也會說：“袁廣發不是爲個人，是爲工廠。”不過結果他仍不免於被取消股長工作，取消工會工作。他還是積極的工作，半天也沒有下過機子，並向那些來表示同情的工人說：“我對科長的領導方式，我對於我們這裡的某些負責同志有官僚主義，不重視工作有意見，科長無理由撤我的職也是不對的，但這是科長的問題，我做工不是爲科長，這是一個革命工人，一個黨員的今天終任務。”他仍自動替每部車子加油，使每月消耗機油二百斤減到七十斤。

就在這個時候，中央落雨間專來麻檢查工作一個多月，開展趙運興整風運動。工人幹部思想都開始有了新的認識，於是袁廣發一下被全部人所了解，所肯定，他是廠內

最忠實的最正確的同志。他被升任棉織科長了，他做棉織科長後便更顯出優越的才能，使難民工廠更走向企業化與正規化。

在取得上級同意後，該科長首先調整生產組織，配備勞動力，精簡冗員，把棉織毛織兩科合併；生產單純集中化，主要生產土布毛呢（毛巾、襪子等停止生產）。按各人的體力和技術程度分配適宜工作，體力較差的婦女，技術不夠的學徒，都不勉強上機織布，以免妨礙生產，調到縫紗，絡紗組上去，生產效率高，他們情緒也高。機器都恰當的掌握在有技術的手上。因此產量逐漸增加，過去每人每月平均生產十二三疋大布，改組後平均每人每月生產二十一疋。今年織單經單線土布，亦能從三疋四疋提到每人平均十四疋。個人的產量增高，脫離生產的人員減少，以前棉織毛織兩科共有十人脫離生產，經過整理後，去年減到四人，今秋只有三人，四個人管理二百四五十人的生產，還顯得有條有理。最近彈鈕科又合併來，一共有四人又減去兩人。

要管理得好，還須要制度，該科長把過去那些複雜的登記表改為簡單的，取消不適用的，為了便於實行經濟核算制，嚴格執行事病假登記，工具、零件消耗統計，原料統

計，產質量統計，修理單，每人生產自記表等。重新討論宣佈勞動紀律和廠規，現在工房非常嚴肅緊張，鐵機達達的響，整齊組的大輪有次序的翻大圓圈，倒紗的小車嘎嘎的搖轉。再也沒有吃煙，烤火，談笑，吵架的事發生了。

現在的生產計劃都是經過工人在小組會上細密討論，從下而上訂出計劃，經常檢查，遇有個別工人情緒較低或有偏向（有工人自動加工四五小時，半夜也要生產），即隨時由組長，科長耐心說服，尤其對於他們要點特別注意適度表揚。更實行全面工資，工人要生活過得美，就得靠自己多生產，賺得多，又鼓勵他們節儉。開始還有極少數有二流子思想的工人工資不能吃，結果大家都努力上去了。去年最高工資可以拿到一月一石二斗，今年還有人拿到一石四斗。最低也可拿到五斗至六斗。

袁科長在施行各種管理制度時，獲得非常多的經驗，今天他又在從一個忠誠克苦的工人而學着去掌握黨的工業政策，和創造實際辦法，廠內工人們都說，袁科長進步真快，大家要學習他。

今年職民工廠又有一個大問題，即單經單練土布。邊區為著在兩年內做到全部自給

，決定發展植棉，婦紡和改織土布。但各地紡紗標準在開始時未能一致，紡手都是沒有經驗的人，也不懂織布知識，結果，太粗、太細、太緊、太緊、不勻等毛病，綢紗太多，很不易選。加以工人不習慣，織得非常慢，非常稀。這種布拿到延安來，曾被批評為孝服布。袁科長難過極了，就親自選紗、織紗，自織出半疋布，延安各領導者才說：「像這樣就好。」可是大部份工人仍織不出這樣的布，於是袁科長細心研究，原來工資是一個問題，布的標準沒有，他便再三說服崔錫忠，盡力幫助他，在七月份崔錫忠織出了標準布，重訂了工資，工人的信心和熱情馬上提高。六月份只能織一百七十五疋，七月後就增到二百四十五疋，八月是四百五十六疋，九月十五號到十月十三號完成建設廳規定的一個月六百五十疋任務。這樣飛躍的進展，確是驚人的。在這半年中，袁科長每天都是思考着工業自給中難民廠的任務。他就很細心的去注意每個工人的思想，情緒，生活，技術，體力，按照各人不同的情況去說服，鼓勵，幫助他們訂出每月的計劃和完成它。把自己倒籠的工資全部拿出來買水菓等來慰勞工人。又發起個人與個人，組與組，組代表與組代表的競賽，工人們就更捲入了這個熱潮，自動加工，犧牲午睡，或者鴉片

起身工作，但只要有工人在工房就可以看見他們的科長也在那裡倒線子或學習寫字。使大家猶疑的單經單緯土布問題已成爲過去了。現在難民工廠乙等布已合乎建設廳的標準，但出產是甲字布佔多數，比市上的五福布還好。

現在袁廣發同志再度當選爲邊區勞動英雄，他是無愧的。因爲他一心爲黨，不怕艱苦，不斷學習，始終如一，所以當他去做一個戰士時，他就會成爲一個很好的軍事幹部，但當他又去做工時，他又能從一個普通工人掌握了技術並成爲一個好的工廠管理者。他在軍隊裡，爲戰士們愛戴；他在工廠裡，又爲工人們愛戴；他現在是邊區的英雄，又爲我們邊區人民所愛戴。袁廣發同志！我們擁護你，並好好的向你學習！

（一九三五年一月解放日報）

模範黨員申長林同志

荒 墓

一 一件大事情

二月二十八日的上午，我在延安縣委王書記房裡看見了一個老年農民，高高的身材，兩鬢都已經白花花的了，瘦長的臉，但却沒有太多的皺紋，臉頰還有兩片健康的紅色。上眼皮都有些下垂，凝蓋着一雙安靜、沉着的眼睛，好像很能思索似的眼睛，兩撇灰黃色的鬍鬚中間，常露着兩顆長門牙，閉起嘴來，嘴唇便有些突出來。他穿一件褪淡了顏色的藍布棉襖，腰間繫一條土毛線的破圍巾；下身是灰布棉褲，布襪單鞋。

「這就是我們的申長林同志！」王丕年同志向我們介紹道。

我們等待這個模範的農村黨員好久了，並且聽說了許多關於他的使我們敬仰的故事。我握住那雙很粗糙的大手，不免有些激動。但還是他，讓我又立刻平靜下來。他很安

靜，並沒有顯出一些被驚擾的樣子；他在我們一羣人包圍中間，安安靜靜地吸着羊腿骨煙管，對我們不斷的問話，用了最簡單的樸素的字句回答。他的這些字句裡，我無論如何不能發覺一絲毫誇張的情感；但是每句話都有著樸素的真理，很使我感動，很使我感覺親切。

就是他，這個平平凡凡模樣的老農，他向我們說：

『爾個的世事，全體人民都能活，咱也能活；全體人民都不能活，咱一個人還能活？保存幾顆糧也不頂事！不怕公家要的多，只要增生產多，能把公家、革命維持住了，也就把咱維持了。』

就是他，當他幫助鄉上做了些工作，被羣衆稱讚老申有辦法的時候，他說：

『可不敢這樣說，工作搞的好，區上有功，政府有功，也有毛主席的功！』這是蟠龍區區委書記曹子元同志告訴我的。但曹子元同志特別聲明了一句：『這話也不是我聽見他說的。是別的老百姓私下裏對我說下的。』

就是他，一個落後的偏僻的陝北的農民，近五十的年齡，有過四十年悲慘的生活，

曾經是一個十多年沉迷在賭城裡「流子」，而現在，他能處處為革命，為公家着想，把自己的一切和革命和政府聯繫得這麼緊，這麼親切！

這個事實，說明了這樣一個絕對的確切的真理：只有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農民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才能在建設新社會，新中國中發揮那最大的潛在的力量。

所以，縣委王警記對我說：

「發現和獎勵這樣一個農村黨員，對我們邊區的黨來講，恐怕也是一件大事吧！」

二 長工的兒子，自己也是十多年的長工

申長林同志今年四十九歲，原籍是米脂縣河岸的人，從他開始有記憶的時候起，他的父親就是一個長工。「我父親侍候了人一輩子！」他堅定地說。但他自己，也是自十一歲開始，便被人「攬工」了，一直到二十四歲時為止，他也整整當了十三年的長工。

「掙哪錢？一年吊四錢，一個當八百的青銅錢，一個二百的銀（小）錢，什麼也不管！」

申長林同志沉靜地和我們拉話，回憶地敍述了他那十多年的長工生涯，他像在敍述一個古老的傳說。臉上依然很平靜。他喜歡用手指不斷輕敲着桌邊，輕輕點着脚，定着眼神想什麼。可是，一定的：儘管那記憶很悲慘，在革命來了以後的鮮麗的印象之前，那過去的記憶到底是淡了色的，不會再引起他太大的激動來了罷。

「我十一歲先給人擗羊，十三歲就給姓石家裡擗工，我們上頭拿驥搗地，咱就打土坑窯，抓糞，受苦還幫結（差不多），一年始擗八吊青銅錢了。以後換了好幾個東家，到十九歲又給姓韓的作了一年，那時會兒已經能領工捉牛了。」

「東家，唉，好的歹的都有，像那個姓韓的就要要脾味！別的好東家吃什嘴好的，憑着還能吃上——遇不着自然算了，你在山角落落裡，還能去叫受苦的回來？」——說：受苦的回來了，上來吃點。在韓家你活着也吃不上，平常吃用也不好。反正給人家受苦，就是這嗎個事情！有年跳出天花，病了一場；有辦法的人家，出一個月才能上地，我只休息了十二、三天，東家就叫上地了。以後這腿不行了，天涼了就腿痛。可是熬苦了：兩個人秋夏要擗八十塊地。擗到黑脫，割上苜蓿（咱們上頭餵牲口都是苜蓿）餵上牲

口以後才吃得上。……」

「到二十四歲，再熬不下來了，就再不想當工了。」申長林連連搖着頭說。

「為什麼？」有同志問。

「唉，」他長長地嘆了一聲。「熬一整年，整二年，我思想，再熬下去也是沒有辦法！」

他第一次對這種生活發生了思想上的反抗。他清清楚楚感覺到：「熬下來總是人家的。」以後，他就開始想自己搞些地來種。但是本地土地是稀少的。同時，他聽說延安能種洋烟（鴉片）【是個發財事！】於是，申長林決心結束了十多年的長工生活，毅然的跑到延安來，夢想開闢新生活。

三 浪蕩無奈的生活中間，以僥倖的心理變作了賭徒

民國七年的冬天，申長林到了延安蟠龍區雷鼓川馬家溝。那一年天旱，又是人生地生，搞點土地種洋煙發財的希望馬上幻滅了。

「聽說咱能受苦，是個好苦，咱們上邊下來的人就叫咱攬工。」申長林說：「咱在上面不攬工，下來又攬工，他娘的下來爲的啥？我就不攬工！」

怎麼辦呢？有一個當巫神的說：「你這樣浪蕩也不是事，不賺錢，總要餓口吃的。你跟我行巫神、法碼器，到那裡總有口飯吃。」申長林就這樣渡過了一個冬天，給人家行巫神、法碼。以後，這個二十幾歲的年青小伙子，雖然有一身『好苦』也只有當了二流子。他跟幾個賭徒曾經生活在一起，到樹林裡拉（鋸）木料變賣過活，賺了錢便喝喝燒酒。這一夥子不多久，就因爲喝醉酒打散了。這樣，申長林又浪蕩起來。他也會安下幾垧莊稼，但他安不下那顆不願意爲人家熬苦的心。於是，一直打打短工，有錢就要賭，『壓明寶』，『摸胡』……從此把整個身心安定在賭城裡去了。

這個賭徒一年到頭穿着一件赤膊露肉的破衣裳，常常一連幾頓都不吃，從這一家賭到那一家，從這一村賭到那一村，能够賭個把月不出門口。賭博能使他忘却飢餓，寒冷和羞恥。他每次一定要賭得精光，伸出手去借不到一個錢，賭友們都拒絕他賭的時候，他才又去打幾天短工，賺了錢，開了賭場，再去賭。

他也會憎恨賭友們的無情，下決心不賭了。但是，他對我說：

「我圪摵（蹲）在那搭兒，聽見樸打樸打，咱就又站起來，壓！」他一伸手，好像要把一切都這一下「壓」光了似的。

申長林同志在談到他過去的生活時，他是正正經經地，就是談到他的賭博，他臉上也沒有「一點點不自然的神情。好像他走過的道路原樣該是這樣的。我却想探求一下他究竟為什麼單單沉沒在賭博的道理，據各方面的調查，他過去除了賭博以外，他却沒有別的嗜好，却也沒有幹過什麼壞事。

同時，據別的同志告訴我：申長林同志所處的蟠龍區，當時是一個墮落的泥坑。們在搶掠、賭博、抽洋煙；無惡不作。那裡的年青人都被這層迷霧遮住了向前看的眼睛，甚至以為不會這麼一兩件，反是個很丟臉的事情。

「為什麼你別的不胡搞？」我問他。

「賭博，我一見就心愛！」申長林在調話中間第一次笑了，簡單的答覆道。「別的，我不心愛。」

我不能滿足於這種答覆。我從另一方面再問道：「以後又為什麼又不賭了？」

他用手指敲了半天桌子，後來說道：

「十七八年成跌了幾乎餓死。不務正，怎喚個求人也不頂事。那喺會唱一家人都下來了，從前我餓，餓一個，一家跟着你餓，怎喗行？」

我終於得到了解答，這還是因為生活問題。生活本來就枯燥看不到前途，一下子不能改變舊的處境，又是在那樣一個污濁的環境裡，申長林就一跤摔下賭坑裡去了。這多少會有些僥倖的心理：想著或許有一天，他突然會從地上爬起來，贏得生活中間所應該有的一切罷。

可是，生活到底不能由賭博來決定。在民國十七年陝北大飢饉年代，申長林一家七口人由米脂求食來到延安，賭了十年依然兩手空空的申長林，那有什麼法子來安置這一家人呢？

三十四歲的申長林，正是農民受苦的壯年時期，可是他已經沒「苦」了，把勞動力也賭光了。

沒有人會相信一個賤徒，沒有一個人借一升糧食來救濟這一家人。年青的三個兄弟還可以擺工勉強糊口，年老的父親，一輩子的是工，在六十多歲的老年餓死了。曾經整整有四十五天（飢餓的四十五天是多麼悠長的日子啊！）家裡沒有看見一顆五穀。

「可熬苦了，」申長林婆道：「兩吊錢買了一斗陳粗糠，拌榆樹皮吃，吃得拉屎也拉不下；腿一滿都餓腫了，動彈也不能動彈。臉沒吃過？吃蘿蔔，苦菜，馬茄子，灰條……什麼能吃就吃什麼，連鹽都沒吃的！」

四 革命轟轟烈烈地來了

一九三四年冬天『時事轉變，革命轟轟來了。』

一開始，申長林心裡是含糊，解不下的。舊社會的農民聽說戰爭和軍隊來到，總不能不有一些恐怖的心情。申長林囑咐家裡的人，『早睡晚起』，並且向他們說：

『可不敢亂說話，一句話說錯，定把命搭了，亂世，咱們老百姓解不下那一套。』但是，這次來的軍隊不同，很奇怪。

『隊伍那嚜會兒打嚜那裡下來了，侍候一頓飯吃了，還要開錢。』申長林笑道：『吃了起身，排上隊，最後他關着，說要短下哈，叫咱們老百姓說，要賠錢，還給捨得捨得傢什，掃地，洗傢什……。』

『咱們老百姓說，可不敢，傢什還讓隊伍洗咧？以後嚜就不怕了，以後什麼支隊游擊隊多多的，當下來，二十三十不等，黑道裡，三不溜溜的就下來了，受苦人可言傳開了，宣傳，革命隊伍哩。』

從此，申長林同志睜開了眼睛，望着新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感覺親切了。

三五年的春天，他們弟兄四個一齊參加了赤衛軍。

在這時候，申長林同志的談話活潑起來，他不再老是用手指輕敲着桌子，却不斷的揮動着手，常常使勁地緊抓着手，好像他將要去拿起一件武器似的，很興奮，臉上閃耀着紅光，聲音比平時洪亮了些，帶着一些顫抖。

『打興龍寨，我也去了。咱們赤衛軍把寨子圍了起來，寨子裡把寨子關起來，也不理。咱們就叫……』

「——你們不開，咱們就要開槍了。」

「——你們一定沒有槍，有槍還不放咧？」寨裡人說。

「——沒槍？這麼大的隊伍還能沒槍咧？一定有槍！人家要放槍，是咱們壓下了，咱說地方上事地方上解決，都是自己人，還是平和些的好。——咱們就這樣喊。咱們還說：——你們不開，寨上有糧可是沒水，關上幾天還不是死？時事到這地了，革命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你這個寨子要開，什麼寨子都要開的！」

「咱們那會兒真是沒有槍，寨子不聽見放槍就不開。後來九支隊來了，大家嚷衝鋒老爺來了，衝鋒老爺一來，一命令開槍，放了幾槍，寨子就開了。咱們進了寨子，寨子裡還煮了米湯給咱喝，說：——你們乏啦，熬苦了。」

「打開了寨子，咱們就回來了，就組織了貧農會。五月裡分了土地，咱們七口人，分了四十晌地。」

從小在土地上生長的，曾經在土地上勞動了廿多年的申長林第一次得到土地。革命就這樣給申長林創造了他以前做夢也不會想到過的『時事』。

五 他參加了黨他記住了一句話：

「共產黨是革命的根本」

一九三六年春天，申長林的一個「相知」約他去談話，他得到通知，他心裡想：「我犯下什麼錯誤了？」可是他去了，他和區委書記談了話。他們的談話很簡單，但是這些樸素的農民的語言，說明了一個大道理。

「闖茲命好不好？」區委書記問道。

「好啊！」

「怎麼個好法？」

「受苦的沒土地，沒牲口，舊社會一滴沒人管；爾個，誰要土地，就給土地；誰還要牲口，就給牲口。舊社會誰管這些事？」

「你看那給你們的土地確實不確實？」區委書記又問。

「已經拿到手咧，還怎麼個不確實！」

「我看不確實，借人家的東西還要還咧，人家土地就不要了？」

「我看確實，這一下把『壓迫』搞下去了，還能讓他翻身咧？」

「後山溝裡有個圓上的豪神，你敢不敢拿去？」

「敢，怎嗎不敢？你們去不去？」

「去，」區委書記點點頭。

「你們能去，咱也能去！」

區委書記笑了，告訴他，要真去的時候，寫信來叫他。

這是第一次談話。過了十多天，區委書記帶信來，又叫申長林去；一見面就問他有件事願意不願意，要他加入組織。申長林先解不下。但是區委書記告訴他：「共產黨是革命的根本。」他就表示「滿意」了。

申長林同志，這一年，把多年積蓄下來的一百多石糧食拿出來款送給紅軍，救濟了一些貧苦的農民。「心也不痛，爾個的時事，要實現平等了。」並且從此根絕了賭博，因為區委書記也會告訴過他，「共產黨員要是個最好的人！」

申長林同志談到這裡，他左手支撐着半邊臉頰，嘆息一聲道：

「舊社會一滴沒教育，革命早些來咱就好了。」

他沉默了好一會。我也隨同沉默着。我有一種在黑夜裡走了很久的疲乏的感覺——可是，倒更感覺到興奮，因為一段黑路到底走出來了。

六 八年的忠誠，四年的負擔

「共產黨是革命的根本。」而像申長林同志這樣的黨員，就是我們黨的根本！

八年來的申長林同志，確確實實能當得起「對黨忠誠」這四個字，這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的評語。

一個普通的農村黨員，常常爲了怕「誤工」，連黨的會議都不願意參加，也不按期「交費」。但是申長林同志，却是能按期交黨費，經常出席會議的。

支部和小組的「議論」，就反映了這樣單純的一句話：

「老申有會就到，不要通知第二次，上山受苦回來，黑地裡也會來的。」

蟠龍區區長也對我講過：有會要老申參加，他一定參加，他去了：「圪蹴在那裡，細細聽。」有時候，聽說上頭公家有人來了，吃了飯，他就含着煙管去到政府，往那角

落裡地放下來聽，有什麼事。

黨所分配的工作，申長林同志從來沒有講過價錢的。小組的同志說：

「老申是一貫的忠貞，這個人抬到哪打到哪，組織上叫他作什麼，就作什麼！」
支部高××同志說：「在×鄉的時候，難作的工作就是老申去，一次動員工作，出門就是半個月二十天，他也不怕誤工；不担一點私事，經常跑，很埋頭苦幹，還說：『我這幾天正跑順路！』」

因此，老申在開頭幾年的「光景」並不好，他笑道：

「咱誤工多了，兩個兄弟就吊兒郎當，也不生產了，一年只打幾石糧食。」

三六的冬天，申長林同志的家裡變做了黨的工作人員經常碰頭的地方，有一次深夜來了幾十個游擊隊員，老申爬起來給熬了一鍋稀飯，像招待「親人」一樣。

「老申，找兩個人帶帶路，繞出敵人的包圍圈去罷！」游擊隊長說。

「唉！兩個可不敢瞎找人，找到歹人遭殃？喚達你們去罷。」

老申連忙跪下炕來，整緊了鞋子說。於是在凜寒的深夜，申長林做了嚮導，領着游

便急馳出了包圍圈，逃出二十里以外去。

「還要贈送，贈就再送一些路。」和隊伍分別的時候，他抓着隊長的手說。他站在山頭看見隊伍走得一點影子沒有，才獨自摸索回來。

三七年統一戰線形成的時候，申長林有些「害含糊」了。可是他却這樣想：「我是一個農民份子，想不到什麼。王邊領導是一定對的！」

申長林同志就是這樣一個黨員，這樣的黨員，他自然會擁護、相信他的「革命政府」的。四年來的公糧負擔是一個最好的證明。我簡單地列個表在下面：

年代	全村住戶	全村負担數目	申長林的負擔
一九三九	十	十一石八斗	五石五斗
一九四〇	十一	十九石四斗	十二石
一九四一	十二	二十二石九斗	十三石八斗一千七百斤草
		公鹽九百斤	四百五十斤
一九四二	十三	二十二石五斗	十二石五斗

公鹽一千三百二十五斤 五百九十五斤

四年來全村負擔公糧七十六石六斗，申長林同志負擔了四十三石八斗，佔百分之五十七強，全村負擔公鹽二千二百二十五斤，申長林同志負擔一千〇四五十五斤，佔百分之四十七。

但據今年的調查，馬家溝全村十三戶人家，有十二個勞動力，共有牛十條。申長林同志則家有八口人，只兩個半勞動力——他自己算半個勞動力，不過是有牛四條。所以不論怎麼說：申長林同志的負擔真是驚人的。

蟠龍區區長向我感嘆地說：

「這個同志是沒什麼好說的！我看，老申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出糧。我在區上下去徵糧有下了，從來沒聽過老申說什麼重畠，多咧，人家說他該出多少就出多少，去年他自動要出十三石，羣衆討論一下，說老申重了，給他減了五斗。去年公鹽要拿出七百斤，他也沒言傳；後來上面調查，說他重了，減了一百〇五斤！」

「申長林常說：——不要緊，差個三斗五斗糧沒擋處，給我擋上，不要因為小小數

目把工作就誤了。

「他還說：——公糧越多出越好，正是自己擴大了，公家要的到底有限。」

當我計算了申長林同志四年的貢糧的時候，我不禁向他問道：

「老申，你覺得負擔重不重？」

「唉，公家困難，人民都出弱；只要把公家難持住，咱就維持住了，咱就這喝個瓢肚。」他仍然用那平平的聲音講，講得那麼自然，似乎在說明一個當然的毫不可怪的事情。「公家也會顧慮的，去年分配上我的公糧，是多少斤……？」

他已經忘却了這個數字。可是一般農民們，對於數字是絕不輕易忘却的。我剛才計算過，我告訴了他，是七百斤。

「對，後來公家就叫咱出了五百來斤，咱還說——工作已經佈置開了，再給人家佈置不容易。頭先，咱兄弟一聽數目，也就說重了；咱說——可不敢這樣說，這種事情，不能用斗量，用秤稱，有一家算一點不算什麼。唉，後來公家自己就減了，咱又沒說過！哈，公家會看得準的。」

申長林和他嘴裡經常講的「公家」這兩個字，總給人一種很親切的分不開的感覺。因此，生產和負擔，人民和政府，革命和黨的組織……這一切，在申長林同志的眼睛看來，在他的思想裡面，是一個血肉相關的東西！

也正因此，老申這個名字在馬家溝、在蟠龍區，是經常和人民分不開的。每次動員工作來了，羣衆就提出：「叫老申來一個罷。」「叫老申說句公道話！」還老申當徵糧評議會委員。羣民可以來找老申借點糧食，不要利；老申反而說：「不能還就算了。」去年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老申借出去一石四斗糧，不讓這些人因為沒吃的去攬工，反而把自己耕作的時間誤了。

馬家溝，他是第一個給家裡買來了紡車的人。

去年調查摸底的時候，他第一個實報，引起了全村的實報。

他是馬家溝變工隊的組織者。

每年的徵糧，他出得多，出在前，還送在前。

這些，就是我們的申長林同志，得到一個機關黨員光榮的稱號的還不詳細的事實。

七 也是積極生產、推動生產的模範

申長林同志也是積極生產和推動生產的模範。儘管四年來他出的負擔較多，但他的「光景」却仍是很好，他現在有四頭牛，一條驢，一百二十隻羊，六孔蜜。

今年，他計劃種够七十五垧地，再買一條驢，估計羊群可以擴大到一百八十隻……。他種的七十五垧地，是多年的熟地，而且是山地，但他爭取每垧地平均能收穫糧八斗——比一般農民多收二三斗。

申長林同志除了指導家庭生產外，爲了推動生產，他參加了全村十二個勞動力組合起來的變工隊，還預備搞社工隊。

他預備給五六家難民，在青黃不接之時，救濟兩三石糧食。

爲了安置兩家難民，他把自己最好的二十垧地租給他們，先借兩石糧食給這兩家難民，並且出租了自己最大的一頭牛，和七十五垧地裡僅有的三垧川地。爲什麼要把大牛和好地讓給別人呢？申長林同志說：

『安莊稼，選好地；沒好地，打不上沒吃的，他還是要走的。』

為什麼把三十垧土地分租給兩家種呢？申長林同志的反應是很周密的，他說：

『分租給他們，好讓他們自己再留下些土地，明年就有個基礎了。』

至於申長林同志自己，他主要是指導他的兄弟生產。他攜着一羣羊（他攜了八年羊，沒有生過瘻癆病），攏着的時候捎帶砍點柴，每天要挑六担水。從春耕到秋收最忙的農時，除了七月，要抽出二百一十個早晨來幫忙頂七十個工。

馬家溝附近一帶的農村裡，都已經普遍地有了這樣的呼聲：老申雖然負擔出的多，但是這兩年光景還是比以前好多了。看起來，每個人還是該好好地生產。莊上一個常海明，公開宣稱要趕上申長林。這個農民前二年才出了五升公糧，去年却出了三石一斗。王屯的一個劉當明，全家六口人，只有他一個勞動力，可是他說：

『我以後也向申長林學習。不要怕公家要的多，只靠增加繁生產，公家要過，咱也

『好光景！』

申長林同志回答：『多打幾顆糧，公家有辦法，大家也有辦法了。』事實上已經被

許多筆者用行動來接受了。

八 光榮！光榮的道路！

申長林同志在三月四日閉幕的延安縣的幹部會上，受到了隆重的獎勵。

汽燈在一間小發紫裡眩目的照耀着，照耀着五六面深紅的，淡紅色的，綠色的綢緞的錦旗。這是西北局、延屬地委、延安縣委、縣政府、各區區委和區政府所贈送的光榮的旗幟。縣委的旗幟上寫的是「黨員的模範」。高樹同志頒獎的却是「邊區公民的模範」。

當我向申長林同志道賀的時候，他迅速點頭，急切地說道：

「一個農民份子，已經出到頭了！」

是的，申長林同志，跟過去的農民相比，你已經是出到頭了。這是你的光榮！但再望前看，新的道路還遠。你還沒有出到頭，你還能再向前走。將有更多的農民份子跟着你走這條道路，這是一條光榮的道路。

（一九四三年三月解放日報）

張治國的故事

周民英

張治國同志是『鐵州』部、『乾彩』連二班的戰士。他的家是貧農，在邊區吳堡縣家鄉。他十一歲就燒火，十二歲就綁羊，十七歲勞動，二十歲就鬧革命。家裡有個老人，和老婆二老五，媳婦妹妹十幾口子，他自己有婆媳和一個娃，現在他們都過着好光景。

他，今年三十一歲，個子不高，粗壯，結實，圓臉，尖下巴，黑胖黑胖的，笑起來圓臉上就現出兩個酒窩，右邊的第一個要深些兒，說起話來很流利，有滋有味。

他有一段很長的故事……

一

那時候，吳堡才剛出產礦藏，小組隊。老大和老四在家裡就有些鬼鬼祟祟的，白天黑夜都不在家，跟一些鄉親們說話，總是在背地圪塹裡，看樣子很不對勁。張治國就

關老大：「哥，你們幹嗎？正經人作正經事，還怕見不得天？」老大說：「海子，（他的小名）甚麼也沒，別閒傳贓！」父親常把他們的行為，跟側邊地主張多太講。父親是這樣一個人：好事不作，壞事也不為。天天辛勤勞動。他還參加了教善會，勸人行善，勸人不宰生，連一隻鷄都不要殺。他怕老大和老四不務正，常罵他們，但他們沒聽，他氣得沒法，到處向人家訴苦。老大和老四就警告他：「大，你再說我們就對你不客氣！」父親就再沒敢言傳了。有一天，大約是臨黑時光，張治國從主家那裡回來了。他碰到老四和他的親姑舅——那個嘴巴子能行，天天從這村跑到那村的小鬼，格攝（蹲）在土塊上拉話，張治國邊跑邊說：「我當追你們的蹤跡，這下……雪地裡還埋得了死人？」他跑過去了。他們立刻就不拉丁。他就問：「你們在這搭說些甚？」老四站起來就想走，他說：「甚也不說。」「那我的眼窩就瞎着的！」老四就冒火說：「你狗拿耗子，多管閒事！」說着，他就和小鬼走了。張治國也冒火了，他說：「你們真龍上天入地！」他擡上去，攔着他們，忽然他變得哀求似的說：「我還能害你們不？」這一下，可真把老四逼定了。沒奈何，老四只好跟他說：要去參加游擊第四支隊。要張治國述些缺和

大面前都不叫說。張治國說：「那該是個好事情嘛！」他想了一會對老四說：「人子，你在家裡照管老人，我去！」老四就一把拉著姑奶奶說：「小鬼！你看誰先說？」老四急得吐了一下口水。「發先說，誰先去！」張治國接着說：「聽！你還是個娃娃，人家保管不要你。」那時老四才十七歲，張治國比他大三歲。老四就很有把握的說：「海哥，你不要虛說啦！姑奶奶是個十四的猴鬼，人家就當寶貝呢！」猴鬼說話了，他拉着老四的左胳膊，樣子想走，他說：「海子，回去，我十幾上又來呀！」海子回答他：「我回去格揪下等死！家裡除開人家的，就沒自己的，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真的，那時他們已經在吃酸棗過日子了。

就這樣，老大就參加了大刀隊，老四參加游擊第四支隊，張治國就參加赤衛隊去了。老五還小，老二的眼睛不瞎，一隻瞎着的，張治國臨走時，他哭得要命。張治國說：「二圪塔，家裡十幾口人要吃飯嘛！再說，我們團成功了，你也就成功了。」老二用手把眼睛一擦：「好！你們都去，我沒用喎！」張治國又說：「赤衛隊就在近處，我還能回來。」老二就發脾氣了：「誰是你回來，你情願死就回來！」勸說不住，張治國這

婆娘抱着兩歲的娃娃走來了，她對張治國說：「我看你要成龍呀！變成呀！」張治國沒理她，掂着一把鐵頭就走了。

二

那時，那赤衛隊藏滿的是鐵頭。白天，他們打聽過那裡的敵人開走了。他們就去刨堡壘，刨敵人埋下的地雷。敵人來了，他們一個個在地裡都是好受苦人。敵人走了，他們就做起宣傳，策紅工作來了。他們跟羣衆談說著將來的世事：拿機器紡織，機器織布，機器下雨，將來的世事；誰也不願追誰，是一個大家庭，大夥兒做，大夥兒吃。老了，不得動彈了，你就到養老院去。將來的世事：幸福的，自由的，美麗的……。就這樣，赤衛隊的好些同志，都帶着一夥夥到紅軍裡去了。張治國可沒去成。那時，他想：多會兒能到一級槍就美了，不管是什麼槍，土槍也行，它到底要比鐵頭中用一些。因為，他常躲在路旁，眼瞪着敵人一隊隊的過去。他氣惱了，向赤衛隊長提出不顧幹赤衛隊。赤衛隊長只問了他一句：『你是不是布爾塞維克？』他就沒話說了。因為，他成

爲共產黨員已經是好幾個月了。

赤衛隊慢慢的鬧好了，人也多起來了，一人打了一個矛頭，鍔上一個小把，擔起來是比帶槍一些。有一次在裡，在一個山上，他們插了好多的紅旗，又弄下好多的紙砲，天一見明，他們就齊聲喊：『衝呀！殺呀！活捉呀！』紙砲響着，村裡的敵人，當做游擊隊來了，有些沒拿槍，有些拿勾子，一股勁兒的跑。這樣，赤衛隊就擡起槍來了。張治國也當起班長來了。

不久，大家都傳說着劉志丹要來，帶領着紅二十六軍，齊整整的隊伍，全是好武器。張治國對同志們說：『你們吹打什麼咧？來，咱就有辦法了。』真的，『交通』送信來說：『劉志丹駐紮在宋家坡頭，要打那家溝。張治國說：『咱這回要好好看看劉志丹，走！』赤衛隊的同志們特別過準備下雲梯，連夜趕去了。

一到，好紅火呀！到處都唱紅軍歌，樹底下，坡上坡下，到處都是隊伍，盡是穿的水藍色衣服，盡是紗的頭巾。老百姓擁着要看劉志丹。那會兒，劉志丹在一家地主的家裡，眼滿滿一院子伊虜談話。張治國就闖進去了。這一下他可達到了目的，他看見了

劉志丹，也是穿一身水藍色衣服，瘦瘦的，長眉眼，下巴上有一撮鬍子。高司令也在那裡。張治國不同意劉志丹對俘虜兵這樣說：「你們回家嗎，還是回原部隊，或者是在咱們革命的隊伍裡幹？回去的就發路費。」張治國憤怒的對着俘虜兵說：「殺，一個個拉出來殺！殺一個少一個！」這還好，等到羣衆大會開畢後，上面不要他去打仗了，要他去指彩號，抬自己的人還不要緊，又是抬的『灰色腦子』，走過一個崖，他就想連坦架一起撇下去。但是，他又想：劉志丹的路總不會錯走的。

三

劉志丹又到北線上去。那裡危險，他就走那裡。吳堡的形勢又緊起來。敵人不斷的圍剿紅區，好多老百姓逃難到烏家梁來，逃到張治國的家裡，張治國得信就回去了，把草給其長燒，燒給難民吃。老子氣壞了，雙手拍着大腿罵：「那些是老子受苦熬下的，你來替我作主版！」張治國沒聽。他又罵：「自己的媳婦露露在外邊吊着，你還要替她繡什麼面子呵！」張治國對他說：「你老人沒把世事看開，不給吃不行。」那時，老

四在綏德犧牲了。老大爺無音息，老子很喪氣的說：「我錯生你三個害！」可是當着張治國要走時，他嚴厲的說：「不准走！當初，我說開不得，你說能行！能行？！泥菩薩過河，自身都難保！」張治國就跟他頂起來了！「死？容易，我也斷不定我今兒死，明兒死，鬧革命又不是唱大戲，人家的人死下一灘灘，我們的同志又不是鐵打的！」對，革命就有犧牲，革命就有流血。

從那時候起，張治國是再沒出去了。原因是那地方的食糧會主任張仲才不務正業，跟游擊隊量糧食，八合算一升，下了驟。大家就做一頂紅綠紙的高帽，跟他戴上，敲起銅鑼鑼，從這村趕到那村，人們都向他臉上吐口水。於是張治國就當了食糧會的副主任，他伯叔哥張思國當正的。地方就移在地主張步太的家裏。十幾面好石窯，雕花窗子，油漆鍋台，油漆炕。張步太早就跑了，只丟下他的大婆姨，婆姨三十多歲，當都是吊著眉妝，生一臉的橫肉，長條條身子，嘴是靈巧得很，這一兩年來，她也學會講革命話，說革命道理。

三六年的秋天，白軍佔領了烏家梁。張治國和張思國就躲起來。不幾天，他們得到信

，家裡的人被扣起來了。並且還說：他倆再不露面，就要殺得一乾二淨。沒奈何，弟兄倆就商量離出去，張治國說：「我走，我受得下苦刑。」蔣思國說：「不，你走半背，留下多幹幾年革命。」張治國說：「革命該留下老人手，我走，把我給罷了，有你走，有革命的同志在。」爭來爭去，張治國就着火了，說：「去，我們都去，去變鬼去！」

張治國硬不讓他走，只好讓他去，張治國淌下了眼淚，他從來沒有過眼淚，連老四犧牲時，也沒淌過一滴。因為這明明是睜着眼睛朝敵人的刀尖上走，但是再有什麼辦法呵？！

蔣思國去了，就在張步太的家裡，就在食糲會住的一間石窖裡，上了好幾道刑，死去活來，沒應承下什麼，後來張步太的妻娘，拿出一包游擊隊吃的火腿條，他去承認下是食糲會的。那婆娘說：「哈！你生得強，也長得強……」她就叫人把他吊在牆圈裡的樑上，婆娘就拿着一根燒紅的鐵條，揚着兩隻鴨嘴，像得勢的老母狗，罵着。她向張思國的背上一烙，皮肉發響，她拿出手巾擦着鼻子，又去燙鐵條。這樣燙着燙着，張思國就沒氣了。她就把他放下來，灌了好幾盞涼水，才緩緩活轉來。

張步太回來了。他從廬山回來，還是騎的那四大紅驥子，穿著黑綵馬褂，光頭，

八字鬚兒，只是臉稍瘦一些，他還帶來好多人。他拍着桌子說：「不行，張治國不露面，這是天色當子？直起格

八字鬚兒，只是臉稍瘦一些，他還帶來好多人。他拍着桌子說：「不行，張治國不露面是不行，殺！殺他家裡的人！」他把村裡的人都集合起來問：「誰是灰色腦子？直起胳膊來！」通通都直起胳膊來了。他奇怪起來了。他又問：「誰是紅色腦子？直起胳膊來！」通通又直起來了。他氣壞了，瞪着鴟子眼睛說：「找張治國去！」他對着幾個『灰色腦子』說：『立地把他帶來！』

張治國是自己出來的。他對張步太說：『你殺我就行，與我家庭無關。』他老子可嚇慌了，急得在張步太的院裡走了好幾回。張步太抽着煙，沒理，張治國跟他老子瞪着眼睛，叫他回去，張治國怕這個古時人，假若跟他上得硬，就會封不住嘴。但他老子沒聽，反而跪在張步太的面前，咚的就磕了一個頭。張步太轉背就走了，沒走幾步，他又回過頭來看他老子一眼，他說：『你正月十五賣門神，沒用臉！』

張治國和張思國並排吊在驟廬裡，腳尖挨着地。張思國的腰子上還釘上好多針，他的頭搭下來，已是半死的人了。張治國見張步太的婆娘，又在階沿上燒炮仗和錢條，一個『灰色腦』在替他扇風箱，張治國向哥瞟了一眼，對他說：『哥，今兒就死下，也不

能應承什麼，死下就死下了，死下咱的革命就成功了，革命的人材還多得很！」

階沿上，爐火熊熊地燒着，那婆娘又取出紅紅的鐵線，格挺格挺的向張治國那裡走。突然，張步太從密裡出來叫着她。他們進密裡和一個軍官談說一陣，就叫人把他們弟兄倆放下來了。張思國躺在騎廄裡，張治國又對他說：「哥，這孫子要來向咱們進行宣傳啦！他也識下革命是大批人要鬧，殺了咱們也不頂事。他要來跟咱們灌米湯咧！」

張步太直說得白沫子直冒。最後他問：「你們到底是不是共產黨？」張治國再也耐不着了，他說：「是！你乾脆把我們殺了！」張步太說：「好娃娃咧！要殺你們，你們早就完畢了，就是看你們還有些轉機。」他又掉轉了嘴：「恰好我們還是一家，古賢話說得好：家醜不可外揚。」臨後還跟他們打了比方：「人不走錯路爲神，馬不走錯路成龍，人，有過只要能改！……」

弟兄倆對他們的話全不理睬，他們也沒辦法，就把他們編在常備隊裡喂驥，喂馬，煮飯，擰石頭，有什麼苦事就叫他們做。常備隊都是『階級不好』的。另外一些二流子，就編成一個後備隊。張步太準備訓練他們一下，開到前線上去。

四

開頭，在常備隊裡，有張恩國，張成榮，李廷等，他們小組裡有六個同志。他們還能在背地裡開小組會，送鴉毛信，送消息給游擊隊，慢慢的，他們就想擴編了。但是沒幾天，張步太就把他五個人派去跟韓蠟略白軍送糧食，再就沒回來。獨丟下張治國一人，但就再沒敢動彈了，因為他想：地主賴，窮人也有不懂道理愛錢的。他想終久會有個好機會。

隔後，當後備隊開到前綫時，常備的好多人都經過家裡找保人保出去了。奇怪！張治國的老子却沒來保他的兒子，張治國是被全村的人保出去的。

張治國回了家，母親哭了一陣。婆娘呢，婆娘先也哭了。唯有老子變樣了，他有好幾天就沒言傳一句，好像受了什麼委屈的樣子。張治國想探探他的心，問：「大，我不是回來啦？」老子的咬着氣，文雅雅的說：「我知道你回來送我上墳山。」突然，聲音就大了，他說：「我三百錢買個輪轆子，一眼就把你看穿了！人家把你們打成那號樣子

，沒見你們把錢毛跟人家拔掉一根！」張治國就對他說：「大，革命不只革他一個人，殺了他頂不了大事。老子奇怪起來，說：「野貓想吃牛，你的心眼還不小，我看你鬧成閻不成？」

那時，差事來了，歐項也來了：青苗捐，角牘稅——就是殺一隻羊，也要出稅，家裡光景越發不能過下去。弟兄們就另（分）開，各自謀吃喝。不外，老大也為病退伍回來了。老二就著氣說：「你們是公鍋巴（拉）屎，頭一節硬！」的確，張治國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瘦得像泥蜂兒，一睡在那裡，一聲兩聲叫不醒。他的脾氣也壞了，打娃娃，和婆娘吵嘴，婆婆鬧離婚，挖苦他：鳳凰落架，還不勝一隻鸞！老二就退後幾步來勸說他：「海子，閻不成就算啦！還有好多的人在家鬧，窮人鬧成了，咱們不也就成了，當初，你也這樣勸說過我……」老二是怕他在家裡弄下亂子，連累一家人。老二清楚他的性子強，死也不向人低頭的。老大也勸說過他，叫他別着急。老大是不行了，他打仗翻山過水，得下個短氣病，氣不轉使獎。但他對海子說：「革命多會兒不死，我也多會兒不死，我忘不下革命。」

看樣子，張治國是聽兄弟們的話了。他比較安心的過了三年，他自種七塊地，還帮

人家攔一羣羊，他看到一切不平的事情都容忍着。他想：革命是不會死的，因為世界上窮人要比富人多得多。

第三年的夏天，侯家園唱大戲，那是人民悽愴得不行啦，盼天下雨，許下的香願。但那又有什麼用呢，就是豐收吧，也還要餓死人，因為那社會，就是張治國做擴紅工作時對農民宣傳的：『老牛賣力氣，自己還是吃乾谷草。』

張治國去了，他是去看戲的。他見好多的人戴上柳葉帽子，抬着龍王爺到處奔跑、跪下、又禱告……忽然他在人群裏發現一個人，那是張成蔡，是走鵝蝴蝶再沒回來的妻成蔡。然而張治國回轉就奔了，他躲進了人堆。張成蔡也奔了，他也躲進了人堆。張治國四方瞧了幾下，從人堆裡出來想走。張成蔡就走來啦，拉着他到山溝裡，問他：『你的工作開展麼？』張治國說：『當老百姓還有個什麼工作？』張成蔡說：『海子，不要瞎哄我啦！』張治國說：『誰哄你，是騙下的。』他想走，他說：『盼你們鬧，盼你們鬧成功。』張成蔡一把抓着他說：『你該不會害我呵？』張治國接着也問：『你也該不會害我吧？！』於是，他們就談開實話了。張成蔡是從×××跑出來的，他找到了組織

，組織上又派他到這裡來做工作，張思國他們也出來了。

張治國又當了「交通」。

五

隔一年，一九四〇年，吳堡變成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時候，張治國就當選為自衛軍連長了。

第二年春天，全邊區動員壯丁入伍，增加抗日力量，烏家梁開了村民大會，決議張治國家裡老五去。這個廿來歲的青年人，剛娶過婆媳，不想去。張治國是擔任這樣的工作：動員，解釋說服，教育。但是，他什麼話都跟老五說盡了，老五還是不想去，而且哭，眼睛哭得像桃子。張治國就生氣說：「看我發動鬥爭你！」老五還他說：「鬥就鬥，淌在河裡還怕打濕腳？爲吃閒噃！」不料老子出來了，他兇狠狠的對張治國說：「雨今權在你手裡，你要誰死就死，生就生？」自從世事變壞，張治國當了自衛軍連長以後，他就對張治國不滿意。他說張治國手不朝裡彎，不拿一隻眼窩來照顧他老人，養兒

防老，栽樹遮蔭，可是張治國連褲帶都沒掙一根回來，還要家裡貼出去。他問張治國：「唉！你山裡的石頭往哪擋，這是爲的甚？」張治國壓着氣說：「爲公事！」老子又說：「公事公事，能過就算是，有時毛牛也能穿過針眼去！」說着，他就抓起鎌把去打張治國。幸喜老二拉着，不然，兩父子就要打起來。老二說：「大，這又不是謙派下的，這是民主來的呀，開會時你也直過胳膊，不叫去，能行？」老子只喘氣，駝背靠着牆。老二又說：「再說，爲一個婆娘就害了老五的前程，這不是睜起眼窺走黑路。」老子緩過氣來說：「去，家裡分下的地誰種？而今種來又是自己的，他不願意勞動，連老五也要逼出去。」老二說：「我種！」老子又放開嗓子：「不准！不准！老子就是個不准！」

臨到所有上隊的人，都集合在區政府裡，快要起身駛！老五還沒打主意去。大家就撇開閒話了，說張治國有嗜動員人家，沒嘴說服自己的人，說他自私自利，個人主義。呵！好多的大帽子，他怎能戴得起，他是一個黨員，是一個經過生死鍛鍊的黨員，黨比他的命貴，他不能減低黨的威信，不能受，不能服氣，他想：只有自己去，同區長討論以後，他就這樣下了決心。

剛到區政府打了介紹信，他婆娘來了，她剛養娃三天。變成那個樣子，又是鼻涕，又是眼淚，比死了人還傷心。張治國就騙了她：「回去，你看我的個兒這樣猴，到縣上去保管驗不上。」真的，婆娘就不哭了。

他把婆娘送回去，就挾上一個被捲走了。

上隊後，他為工作走過一回家鄉，老子却變得很悽惶的樣子對他說：「海子，你一走就走了。連口信都沒捎過半句。」說着就撲簌簌的掉下了眼淚。「我這老牛和你們相跟不上，走得太慢了，你也不可這樣逼我呀！革命，我又不是不叫你闖，我盤算；而今好世事到底鬧出來啦，是歌手的時候，團團圓圓過過好日月。」張治國對他說：「大，這世事還是個開頭，將來更要鬧得美。」他這次回來很受感動，很高興，特別是婆娘，又紗紗，又織布，還要開會，忙得很，她進步了。但還是哭了，對丈夫說：「我當你真是蠍子的尾巴，後娘的心呵！」張治國要她丟開他。她反駁說：「樹葉兒總是要落在樹根底。」

他在家裡住了一天半，臨走時還碰上張步太，這個人在外邊經過好多風波，見過好

多的世事，剛回來不久。他還有點怕張治國，但是張治國對他說：「而今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在咱邊區是誰也不壓迫誰的。」

六

部隊在瓦窑堡駐防時，張治國得了模範戰士的獎勵，他的條件是：對黨忠實，工作積極，對同志誠懇。

今年開春，部隊上實行告假制度，上級准他回去探家。就在那幾天，黨裡邊進行生產動員，開了全團生產動員大會，他也去了，會議開得很紅火，好像要開到戰場上去一樣，好多同志上台宣佈和吳滿有應該。排長走他面前過，問他：「張治國，你敢不敢？」他滿不在乎的答道：「敢嘛，還不敢？革命的事，誰還不敢？」排長推着他說：「那就上台去，快！」他就結巴起來了，說：「這，咱就不敢了！……沒程度，講不了。」「又不是叫你作報告！」旁邊好多同志說。後來他是請教導員替他宣戰的。排長可想起了一件事，問他：「你不是要回去探家麼？」張治國說：「要走，我早就揹上背包走了。」

，黨的號召還能擦下？你不知道，婆婆總是個笨腳石，你回去，鼻子眼淚的，對你倒是很香！」

第二天，他隨着部隊挖甘草去了。開初，當地老鄉們說：一天一個熟手才挖七、八十來斤。張治國也跟好多同志一樣，生手，沒挖過，當連長叫眼裏滿有應戰的挑選鐵鏟時，在一百多把裡，只有一把又寬又大的，他選上了。同志們笑了，都說：「老張，這不是挖地呀！」他說：「輕飄飄的，咱總是不喜愛」。

廿一天過去了，他每天由三十三斤，增到五十斤，又增到八十斤！，而且三分之一是天津草。他的名字在團裡的「生產戰線」報上，用頂大的字登出來啦！同志們很奇怪，都跑來問他：「老張，你怎麼的呵！」他說：「沒什麼，只要下決心，一心一意挖甘草，就能行。」他邊挖邊說：「不怕慢，單怕站！」凡是來問他的同志，他就把這句話告給他們。一天，他正在四尺多深的坑裡挖一根天津草，忽然他聽到好多的同志喊：「團倒呀！活捉呀！」他跳上來一看，好多的同志在撲一隻兔，他沒理，又跳下坑去了。沒多時，兔子活捉了。那些同志，嘻嘻哈哈，喜成那樣子，跑到張治國這裡來了。張治國笑了。

，他右臉上的酒窩又深啦，這是他快要批評同志的時候。他對那些同志說：「同志，這樣……散遊一陣，再抽上一袋煙，談笑一陣，同志，時光就完了。日月是不由人呀！」在平時大家就心服他的批評，於是，幾個人，你看我，我看你，灰溜溜的，張治國又說：『挖呀！這搭滿是天津。』一個同志感動的說：「這是你挖下的嘛！」他對那個同志說：『這，像又沒看開，水流各江還不是要歸大海麼，你挖我挖還不是爲革命？』

就在那天，他挖了一百〇五斤。

可是他的手腫了，發紅，明胖胖的像饅頭，一隻有兩隻那樣厚。指導員叫他休息過好幾次了，他不。一次早上，指導員叫他在房子裡睡下，就揹着一把鐵鎌出去了。可是一當指導員臨黑回來時，張治國也揹着一大捆甘草回來了。指導員就給他下命令。他就反問指導員：『我是共產黨員？』指導員答：『是，怎麼不是，好黨員。』他說：『那我就有心了。』指導員斷定說：『我知道你有心爭取勞動英雄。』張治國說：『先是這麼盤算，現在膽子就放大了，要想爭取模範班、模範排……』指導員又叫他休息。他說：『黨員，我只記下作模範，休息了影響不好，指導員，不礙事！』真的，他沒休息。

，好多同志就不好意思掛號了。因為只有他的手腫得兇。他班上的副班長，手上起了三個泡，掛了號。他就把雙手攤開對副班長說：「咱倆比比。」副班長耳朵根都紅了。只說了一句：「明兒我也去呀！」張治國說：「對嘛！要爭取模範班呵！」

在「志丹突擊週」（註）中，模範班的旗子，就掛在他們二班的牆上了。

七

張治國那個營——吳泓營提出了口號：向勞動英雄張治國同志看齊！要展開張治國運動！要創造無數的張治國！

接着就開了一個軍人大會。在會議上，那樣多的同志呵！都來看張治國，奔過去，向他敬禮，也可成為媳婦啦！是的，他變了，雖然他還是那個不高的個子，黑胖黑胖的圓臉蛋，雖然還是穿的那灰軍裝。但他在擁過來的同志們面前，不自然了，手腳沒處放啦！他笑，也是不自然的笑，一些同志慰問他：「老張，你辛苦啦！」他回答：「不苦，就不叫做困難，要克服困難，就要苦些兒，先苦後甜！」他真沒辦法回答同志們，有些

要看他的手，有些要看他的鐵銃，有些又問這問那。他只是不斷的說：『同志，我沒什麼，你們也能學得到，你們也能得到光榮……』但是，另一些同志就不敢正面的看他呀！一碰到張治國的眼睛，眉臉就紅了。特別是那完不成任務的楊綿子同志。在會場裡，頭就敢抬起來。當會議開到中間時，他發言了，他說：『要和張治國比賽，超過任務一百斤。』這對於他是一件不小的事情，因為同志們都是這樣形容他的：工作在後頭，休息在前頭，吃饭拿碗在前頭，放哨發妖風。可是他直起胳膊來喊口號了：『偷煙是無恥！』『向張治國同志看齊！』接着就有五十多位同志向張治國挑戰。

好！張治國就是這樣盤算的：用自己的模範來影響別人，推動別人。

是的，只要你到『蘇州』團去吧，同志們首先就向你談說着他，談說着他為黨、為革命，忠實、堅決、英勇奮鬥的故事。光榮呵！我們的旅政治委員送給他一面旗子：

『生產戰鬥同樣光榮！』

羅專員也送給他一面旗子：

『堅苦勤勞，挖甘草的模範！』

還有兩條毛氈。

然而他又有主意了。他說要把這些東西捎回去，來影響父親和家裡莊裡的人，讓他們也分得他的光榮！

【註】今年「五一」節為紀念劉志丹同志而發起的七天突擊。

（一九四三年五月解放日報）

劉主任

莫艾

一 『毛主席的話』

南區合作社的辦公室，現在更新穎而光整了，潔白的牆壁上，擦刷得一點灰塵也沒有，那上面端端正正的懸着一幅彩色的布條：

『合作社的模範』

書贈劉建章同志

毛澤東

『是毛主席送的嘛！』

『毛主席送的嘛？』

『你不識字，我唸給你聽吧……模範……劉建章……毛澤東』

『模範！毛主席說的，哈……哈……哈……』

『對着呢，毛主席說的呀，我們的好主任。』

這密洞裡興奮而且緊張。送股金來的，商量問題來的，以及串門子來的，這些川流不息的老鄉們，他們還要比劉主任更加高興呀，白布或毛巾包紮着的十幾個人頭，擁擠在那幅題字的前面。

老鄉們，伸出他們粗壯的勞動的手掌，好奇的，在那題字上撫摩着，撫摩着。

二 群衆的偉人

『秘密麼？很簡單，只要真正能够爲羣衆的利益着想，把合作社的業務和羣衆的生活聯繫起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

南區合作社劉主任，劉建章同志最後答覆了我的追問。

的確，他全部秘密就在這裡，延安南區的人民流行着兩句俗語，他們說劉主任是他們公共的儲人，南區合作社則是他們全區人民的驕傲。他們之中誰有了問題，都要來請

致他，疾病、死亡、婚嫁和缺乏生產用的工具，要來請他幫助，如果鷄子生了蛋，做買賣賺了錢，或者是穀子吃不了，怎麼辦呢？，那末，誰也不會遲疑，『到劉主任那裡去吧。』

『劉主任是共產黨員，是真正幫助我們謀利益的老實人。』南匯一個叫方德元的老百姓，他毫不思索的告訴我：『這是我們誰也不懷疑的。』

建築在羣衆基礎之上的這此風俗，不是偶然的，這裡有着很多有趣味的故事：

二鄉農民楊生貴，一九三六年入貿蘇三五元，後來又陸續加了二十元，共二十五元，從三八年起，四年中賣掉八架。比市上便宜二百八十元；火柴二十包，比市上便宜一百元，布疋四十丈，比市上便宜二百元，四〇年年底討兒媳除布十丈計三百六十元，一年底仍還原數，但要照布價來算，應該是一千六百元了，這裡又便宜了一千二百四十元，二十五元股金現已滾到二百元，淨利一百七十五元。

南莊舍農婦李氏利用空暇，去年一年紡紗八十三斤，織花四十一斤半，值四千一百五十元，合作社曾獎勵她四次，現幣和綢子毛巾等合算在內，值三百元，這樣，她全家

三口的衣服和日用品都顧上了。

金益區一鄉農民薛開有，三八年十月入股十元，年底以三百元買驢子一口，向合作社借了二百元，過了三個月，他把驢子賣給別人的價錢，就是五百元了；南區四鄉農民李毛子，三八年十月入股三元，三九年春合作社借給二十四元租牛一頭，多打五石糧食，值當時市價八百元。

去年春天政府動員教育經費，自衛軍放哨費三萬元，高嶺灣生產股金八千元，銀行儲蓄券二萬元，共六萬二千元，分三次動員，每次每戶開會收集，要誤工一個，三次誤工三個，全區一千七百餘戶，應該繳這項捐款的至少一千戶，就是要誤三千工，每個民工以三十元計，單只這項誤工就要九萬元，又加上六萬二千元，總共負擔數就是十五萬二千元，但合作社以部份紅利都一齊代人民把六萬二千元交納了，這裡無形中幫人民節省了九萬元的負擔。

像這一類例子是非常之多的，而它的發明人就是這位爲羣衆所崇信而被稱爲公共傭人的劉主任。

三 懂得群衆的感情和需要

他在合作事業上的發明是很多的，他爲什麼獲得如此多創造呢？一句話：他懂得羣衆的感情和需要，同時也因爲他善於調查研究，掌握材料。

全區一千七百多戶，七千一百多人，除了個別新來的移難民外，他完全是熟識的，這熟識不僅是一般的『點頭之交』，每一戶的財產和每個人的性格，他都是透明的。他有一本很寶貴的冊子，那一戶多少人？多少勞動力？種多少冬麥？多少糜穀？副業收入多少？以至鷄鴨猪馬牛羊，都記得清清楚楚的。他調查的方法，也是多樣的，他經常在『談家常』中了解每戶的經濟情況，有時也進行正面的調查，像這樣的對話是再適當也沒有：

『多少人？多少牲口？』

『你爲啥調查？』

『你不是要買鹽、買鹽、買布……麼？我問清楚後就好預先準備了。』

「他是給我們謀利益的老好人。」我們應該把一切都告訴他。

這是確實的情形，按照他的調查與統計，他得出了每人每年平均須向外購買必需品的消費數字，以三八至三九年物價計：尺三寬五丈長的老布一疋十八元，農具五元，用具六元，應酬六元，四斤半食鹽、一包火柴、一升水烟，加上迷信品五元，共計每人每年須消耗四十元；四二年冬則須消耗一千五百元，如果每人把他的消耗費預先用半數入股，則合作社所賺的紅利，就可把這些開支完全解決了。他佔有了這個材料，因此，他所領導下的各個合作社，進貨和銷貨，都是按着他所計劃着的規律進行的，剩餘或虧本的事當然就不會發生了。

他對人也是有研究的，他的方法是：「爲了教育他『可以放得開些』，只要掌握了原則一方面，就是更遠大的利益一方面，對於歡喜佔便宜的人，不妨給他一些便宜。」廿里舖有個名叫老張的農民，他對合作社是沒有認識的，在個性上是貪小便宜的，劉主任徵求他入股的時候，他幾乎說出一百廿個困難。

「真的沒辦法麼？」劉主任問。

『誰騙你，我現在還希望能借到二百元哩。』老張負氣的回答。

『我借給你好丁。』劉主任真的馬上借二百元給他，並且幫他計劃了一回買賣，過了兩月，淨賺一百元，於是老張恍然大悟了：『原來合作社真有好處。』他現在已經入股八百元了。

有個鄉長，他在羣衆中的威信很高，但他對合作社的認識也正和老張一樣，並且要把已入的股金抽回去了，劉主任一再告訴他，過了年就會一本一利了，但是他終於抽回了，並且影響着他莊上的另一個人也把股金抽回了，劉主任索性多叫了兩個和鄉長同鄉的社員來，在說明社務情形之後，就告訴他們：你們如果要抽股金，現花照抽好了。那兩個人沒有肯抽，過了兩月分紅的時候，果然一本一利。於是這兩個人就到處宣傳，劉主任的威信更高了。而鄉長也就懊悔不迭，但還沒有因此轉變了他對合作事業的認識，因為鄉長在群衆中威信很高，劉主任決心要爭取他，合作社買了幾千隻羊子的時候，就以較賤的價錢，分了五十隻給他，第二年就變成八十隻，鄉長的生活大大改善了：『你不要看作社，羊如何辦上？』劉主任半開玩笑似的問他，到了這時，他被現實的事實教育了。

育過來了，他現在是一個分社的主任。

四、突破『教條』

一九三七年，劉主任還是當會計的時候，他看出一點：『為什麼要限制每人最多十股呢？在這裡，誰敢操縱，不是股金越多越好麼？小小的資本能做些什麼呢？』但他和王天經（當時的主任）同志商量的結果，他的提議遭到了尖銳的反對：『你要個人發財，實行資本主義麼？』而王主任對他的回答則是：『上面的指示呀，怎好更改呢？』

互相間的爭論是很激烈的：

『你現在一個資本也沒有，怎能掌握人家的資本？』

『同志，只能平均入股，多不得的……』

『錢在我們手裡，依人計數，依股分紅，即使有匯入一百萬元，那對我們有什麼損害呢？』

股金的限制終於取消了。接著作為爭執題材的是紅利問題，原來是上半年入股，紅

利多得，下半年入股，紅利少得，而劉主任的意見呢，不分先後，平等分紅。

「那不是太不公平了麼？」這是一位對合作很有研究的人疑問。

「是的，表面上看來是不公平。」劉主任說：「但是爲了刺激羣衆能够多入股，我們如果能有大批資金，來回一大，利潤也就跟着增高，上半年入股人所得的紅利，不會因而減少，相反的會增加了。」作爲這個理由的根據還有兩點：第一，上半年入股的人只佔少數（四分之一）。多數是下半年入股的，很快的使他們得到很大的紅利，那對於他們實在是多麼大的一股刺激力呢？第二，我們現在須要更多的股金。

經過三天的討論，當這個提議通過之後，合作社的股金馬上由一萬二千元上升到四萬五千元了。

五 『托辣斯』

這不同於私人企業壟斷下的『托辣斯』，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

南區合作社的附近是沒有商店的。但在一九三八年，一位名叫高其貴的『貨郎』，

把歷年積蓄的三千塊錢，準備在三十里鋪開鋪子了。

劉主任找着他，他們談論着高萬有的故事：高萬有也是喜歡做買賣的一個小商人，他到城裡一家大商店去批貨，但他只有十塊錢，那大商店的掌櫃很『慷慨』，居然又賒了五十塊錢的貨物給他，可是貨還沒有銷售出去，而一個月的期限已經到了。高萬有只好以五十元的代價採賣了一石麥子，隔不幾天，麥價飛漲，每石竟漲到一百元了，而賒來的貨物呢，過了兩個月才賣出去，只賺了十二塊錢，而他在無形中很早就損失了五十元了。

『資本小，轉不過身來，』於是劉主任向高其貴說：『向大商店賒賬吧，高萬有何嘗不是這樣想呢？但結果垮了。』

『大家合作起來，力量就大了。』這句名言終於把高其貴說服了，雖然還是設立了鋪子，並且得到合作社雙倍於他底資金的投資，但這家鋪子已不是私人的謀利工具了，而成為農民們集體的經濟組合了。

這就是南區合作社『集體分社』——興華社誕生的經過，現在這個分社的資金已達

十二萬了，它和其他的十幾個「集體分社」一樣，總社給分社投資，而分社在盈餘額內，又抽出一部份資金向總社投資——發展生產合作。這樣，分社成為總社的一個細胞，它們的關係相互交錯的結合着；分社可以因時因地策劃便民的業務，經濟獨立，但在政策上，必須絕對受總社的領導；分社關心着總社，總社的力量更加增大，並且真正成為南區農村經濟中的領導中樞，運用自如了。

劉主任認爲這個「把商業爲合作」的政策，對於南區合作社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六 兩項傑作

『運鹽是有利的，爲什麼老百姓不願意呢？』一四一年政府領導運鹽的時候，有些人情緒相當低落，曾有謠言傳播：『某人的驢子運死了』，『某人死在路上了』。如此，部份的農民，甚至用病驢去駛鹽，『讓事實來擊破這些謠言，還是由合作社來包辦吧！』劉主任盤算着。

在他的號召底下，全區的群衆頓時都傳開了，大家爭先恐後的把代金送到合作社，算做股金。合作社專門組織的運輸隊，於是熙攘在延定路上。合作社的股金立刻增加了七萬多。農民方面呢？代金算作股金，公鹽是由合作社代他白運了。有運輸能力的，索性成為合作社運輸隊的隊員，例如西鄉姬生華，在合作社集體運鹽的組織裡，三個月運鹽三次，賺了一千三百元，這要算運鹽中最豐的利潤了，原因就是組織在集體和運鹽隊裡。

像這一類便利民衆，便利政府的創作是很多的，但最出色的，要算包繳公糧了。四年公糧二十萬石，造謠傳子就宣傳四二年一定是四十萬石，部分農民的生產情緒因此低落了。邊區政府雖然公佈四二年公糧決不超過十六萬石，可是個別老百姓依舊將信將疑。

捎日子梁農民方德元，還是唉聲歎氣：『困難呀！困難呀！』

『我說一點也不困難，你說，究竟有什麼困難？』劉主任詰問他。

『不是今年的公糧又要加倍了麼？』

「政府已經決定比去年減去四萬石了，你說加精，難道鄉上沒有給你言傳麼？」

「哦！言傳，言傳還不是那回事！」

「老方，我給你寫包裹。……」

於是劉主任便把方德元的家業一算：老方是民國二十年前從上邊移來的難民，革命前還是全家四口人的窮光蛋，現在有兩個驥子，一馬一驥，三牛百羊，值市價七萬元，兄弟倆都討了老婆，花去了四萬元，四十來垧分得的土地還不計算在內，已淨了十一萬的家業了。劉主任向他提議，叫他把全家副業和人口入股，依照合作社的計劃種莊稼，保證他明年的家產增加一倍。這個提議雖然沒有成功，但方德元還是使四一年出的公糧數十三石，預先交給合作社，算作股金。劉主任給他的保證是：公糧無論漲多少不要老方負責，預繳的公糧算作股金，照股分紅。方德元的生產情緒不僅安定下來，而且大大的提高了，去年他開荒八垧，多打了三石多細糧，而去年應交的十三石公糧，合作社以紅利帮他全交了，他所豫交的公糧，還算做他的股金，絲毫也沒有損失。方德元今年真是高興得了不得，他今年還要開荒八垧。他到處宣傳說：去年的十三石公糧由合作社帮他

白交了。

去年包繳公糧總數計二百六十石，包了的人固然提高了生產熱忱，沒包的也穩定了生產的信心。

「假使在繳糧的時候收買不到穀子，那怎麼辦呢？」我問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說：「一定要和老百姓的消耗聯繫起來，羣衆需要買合作社的日用品，那末，他就非賣糧不可，如果不能掌握這個條件，合作社就要垮台了。」

「假使遇到災荒，羣衆無糧可賣呢？」

「不會全邊區都遇到災荒的，假使真的不幸這樣，那我們就要提早到非災區收買去了，而且不僅要代交公糧，還要調劑老百姓的需要哩。」

他非常有把握地，毫不思索的回答我。但是他也顧慮到一點，縣政府是希望南區合作社今年把全區二千四百八十石公糧全部承包下來，但是他核算的結果一千二千餘石公糧值時價三百萬元，總社全部資金只有二百萬，是沒有充分把握控制這個鉅大的數目的，

同時陡然要收買這樣多的糧食，一時也不易收到，所以今年包了三百石，值時價三十餘萬元，『事業的成功，要從逐漸試驗中得來。』不輕易發笑的穩重的面孔，在談到興起的時候，他底長着黃鬚的兩唇也裂開了。

七 聰明和毅力

劉主任是一位外表很樸素，其實是非常聰明和毅力堅強的人物。他計劃要做的事情，在任何情況之下，總是要把它想通和做通的。

在包繳公糧的方針還沒有想通以前，他的妻說：『他好幾晚沒有睡着呢！』在黑夜中，睜着他那灰白色的眼球，像呆子似的直瞪着漆黑的窗壁；這樣久了，從窗外邊進來的月影，就把他吸引到外邊去。這時，他底腦子只有一個問題：『是的，縣政府的顧慮也不錯呀！假使買不到糧，怎樣交代政府呢？』他為這而煩惱了，他底思想也更集中了，經過日以繼夜的反覆的考慮，他想通了：『包繳一定數額的公糧，是有保證的，老百姓必需向合作社購買日用品，那末，他們是不可能不出售糧食的。』

在每次計算紅利以前，也正是合作社遭遇到考驗的時候，社員們如真的把紅利提回，那合作社的力量不但不會增強，在戰時物價的威脅下，很顯然的，必定會削弱以至無能再起作用了。何況南區合作社雖是不斤斤計較公積金的呢——那當然是更會垮的快了。這時，劉主任的灰白色的眼球，又沉着下來了，在漫漫的長夜中，他終於找出了一條規律：『更密切的和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吧——紅利當然要分給社員，但是是可以通過合作社，把這些紅利在社員自願的原則下，為社員做更需要做的事呢？』

在劉主任的號召下，南區的人民，在四一年，把紅利請合作社代交了公債票；去年的一百萬紅利，又算做公墮代金入股了。

他的這種毅力和這些辦法，使他的助手們非常服他，沒有信心，沒有興趣和『合作社不能夠存在』的想法，都被事實糾正了；而『合作社股金算做負擔』的說法，南區的民衆也自動的糾正了。

『你怎樣想起這些辦法來的呢？』我熱衷着他底棲素的面容，譏諷他底回答：『時刻刻的把心思用在業務上，要想，要多想，不要急，辦法自然就湧出來了。』他並且

繼續為遠而解釋着：「想通了，就要堅持，事情的好或壞，在沒有真正得到證明以前，不能半途丟下……要負責任。」他說到最末一句的時候，似乎特別加了一點勁。

他就是這樣一個勤於思索，富有毅力的人——當然，不是脫離情況和人民生活的抽象的思索。

八 曾是五次被刦的商人

他是葭縣人，在四十五年前，生在一個賣掛麵為生的貧農家裡。很幸運地，他讀了一季「冬書」（即冬學），後來又在小學裡唸了不足三年的「長學」，於是他就做了米脂一家地主的夥計——管帳的，兵荒時一隻十兩銀子的元寶不見了，老爺咬着他偷竊起來的，於是他只好逃到山西。從此，他就成為當兵的，趕驢子的和做買賣的商人了。山西的臨縣、塞外的鹽池以及包頭、韓城等，都是他經常來往的地方。

他對人的態度非常和厚而謙虛。冬天了，他披着一件老羊皮大氅，無分風雪晝夜，經常在山溝裡串着，一個月只有五天的時間在總社裡，其餘的時間都是奔走在分社裡或老百姓的家裡。

我會和他同行過幾天，幾乎每一個人都要招呼他，而且是親熱的招呼他。

他除了會醫病以外，還會「算命」和「相面」，「見他的鬼——可算的好得太呢。」他自己也笑起來了。

他曾是五次被刦的商人，他的兩手至今還有被綁的印痕。他做買賣非常精明，但是每當「腰綁萬貫」的時候，就都被盜匪搶劫淨光了，而當時官府三十多種的捐稅，還要壓在他身上，有一次，他向某一個高利貸借了十塊錢繳納「維持費」（等於十石細糧），就是因為這「十塊錢」的原故吧，「本上加利，利上滾利」的結果，他也就像成千成萬的農民一樣，流於赤貧。「一九三五年參加了革命——這是我的新生活的開始——他說：我找到了歸宿了。」

是的，他找到了歸宿了：在革命的陣營裡，把他的能力完全發揮出來了。

——也許你會不相信吧：一個沒有受過合作教養的小商人呀，怎樣有這樣的創造呢？不，告訴你，而且事實告訴你，這裡一切新型的創作，大都是這些曾被埋壓着的勞動人民，在實事求是的艱苦鍛鍊中，所創造出來的呀。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三日解放日報）

（完）